

青年蔣中正的革命歷練(1906-1924)*

黃自進**

摘 要

「勇敢、誠篤、知兵事」是孫中山對蔣中正的評語。此一評語不僅反映出孫中山長年對蔣中正的觀察所得，也為蔣中正為何能得到孫中山的青睞，在眾多青年革命同志中脫穎而出，提供最佳的註解。

蔣中正的勇於任事，首見於辛亥革命時期刺殺陶成章一事。陶成章原為同盟會大老、光復會首領，蔣殺陶不是因他反革命，而是因為陶擬爭取浙江都督，有意取代滬軍都督陳其美在上海的地位。鑑於陳其美為孫中山嫡系，保陳就等於保孫，蔣的果斷決行因此得到陳、孫的肯定。

蔣中正的知兵事，和他的軍事學歷背景以及他在中華革命黨東北軍及護法時期粵軍陣營的實際歷練，密不可分。尤其當孫中山總結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於革命黨沒有自己的武裝勢力，認為今後革命黨應以培養自己武力為首務，蔣的知兵事便成為孫特別借重的原因。

蔣中正一生事業始於陸軍軍官學校，已不容贅言。而蔣之所以能出掌該校，孫中山的賞識實扮演關鍵性角色，且符合時代對新領袖實踐能力的需求。

關鍵詞：蔣中正、中華革命黨、孫中山、陳其美

* 本文是國科會研究計畫獎助成果之一，計畫編號是 NSC95-2411-H-001-047-。撰寫過程中，承蒙同仁黃克武、潘光哲教授惠賜寶貴意見，至為銘感。對匿名審查人的詳閱斧正，作者深感受益，謹致謝忱。

** 收稿日期：2009 年 1 月 20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 年 5 月 1 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 言

蔣中正與廿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密不可分。研究蔣中正，為探究廿世紀中國史的重要一環，相關研究不勝枚舉。不過，若與其他時期相比，以青年時期蔣中正為主題的研究，仍有眾多可探討的空間。至今為止，只有二本專著以青年蔣中正為主題：一本是編著性質，全文沒有註解，亦無評析，僅直述蔣青少年時期的生涯點滴；¹另一本聚焦於該時期蔣所思所為，條理明暢，論證平允，可謂經典之作；但是，這本三十八年前出版的舊作，²因受限於史料，多處仍有不夠鞭辟入裡之憾。首先，該著未及參照近年來在美國史丹佛大學所公開的〈蔣中正日記〉、國史館珍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等第一手基礎史料，欠缺細膩的觀察視野。這使該著在史料基礎不足的情況下，逕援引行為科學理論，以蔣中正的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及整合危機(integrity crisis)為主軸，³解析他青年時期政治人格的成長過程。其次，該著實際探討的重心在 1916-1923 年間，因而沒有分析蔣在中華革命黨初創時期的角色，對 1914-1915 年間蔣在東京的所作所為，幾未觸及；對蔣與孫中山的往來關係，如何從疏到親、如何得到孫的賞識等議題，亦欠探討。至於其他相關著作，大都侷限於某一主題、⁴或

¹ 崔曉忠，《青年蔣介石》（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

² Pichon Pei Yung (P. Y.) Loh (陸培涌),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³ 作者認為，蔣早年之所以投身革命，陳其美扮演關鍵性角色；是以，1916年陳的被刺，對蔣打擊甚大。爾後蔣一度無法安心工作、無法與同志共事，實因失去良師益友，無法面對爾虞我詐的外在虛偽世界。探討蔣內心的挫折、焦躁及自我的調適，就成為本文重點。參閱 Pichon P. Y.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pp. 51-65, 102-108.

⁴ 鐵軍，〈蔣介石與討袁之役〉，《中原文獻》，卷39期2（2007年4月），頁49-68；王光遠，〈蔣介石早期的軍政生涯〉，《文史精華》，2002年第11期，頁51-59；史哲，〈青年蔣介石的內心世界〉，《報刊薈萃》，2006年第11期，頁50-53；桑鏞炳著，林放譯，〈早年的蔣介石先生（節選）〉，《檔案與歷史》，1986年第2期，頁97-100；郭緒印，〈蔣介石早年與幫會的關係〉，《歷史教學問題》，1989年第2期，頁52-53；靳明全，〈蔣介石並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頁81-82；田中健之，〈日本の中の近代アジア史(12)日本陸軍に留学した蔣介石〉，《中央公論》，卷12期1（2007年1月），頁284-287；Shou-kung Li, "Chiang Kai-shek and the Anti-Yuan Movement,"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1:1 (Fall 1987), pp. 70-111.

某一時期。⁵總之，有關青年蔣中正的主題，仍值得進一步探究。

有鑑於此，本文特援用〈蔣中正日記〉及日本政府對孫中山、陳其美、蔣中正的監視紀錄等第一手史料，冀望在掌握蔣中正的主觀意志，以及蔣與孫、陳二人往來的客觀具體事例上，重探青年時期的蔣中正。

探究蔣中正的革命歷練以及政治人格的成長，大致可以區分為以下五個主題：

第一，早年的蔣中正隸屬於陳其美門下，他如何得到陳其美的賞識，又如何繼承其衣鉢？

第二，蔣中正是因陳其美的引薦，才得以結識孫中山，在蔣和孫交往過程中，陳其美扮演何種關鍵性角色？

第三，蔣中正有哪些具體作為，使他能得到孫中山的肯定，從此樂意不次拔擢？

第四，蔣中正得以崛起，與時代的需求密切相關。因此，面對時代的挑戰，蔣中正的人格特質又如何回應時代的需求？

第五，蔣中正在接任黃埔軍校校長之前，爲了爭取一個可以充分發揮自己才華的舞台，曾於 6 年期間創下 12 次辭職的紀錄。這些抗爭經歷，與蔣中正的自我調適以及自我設定目標的達成，有何種互動關係？

本文即針對上引五個主題，逐一探討，期能縝密論述青年蔣中正的革命歷練，進而對蔣中正的崛起過程有更深層的掌握。此外，爲求易於辨讀，本文一律書寫人物本名，不用別號。

⁵ 黃黎，〈1926：蔣介石初露崢嶸〉，《黨史博采》，2003 年第 10 期，頁 29-33；鐘康模，〈陳炯明叛變前後的蔣介石〉，《廣州研究》，1988 年第 6 期，頁 51-55；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蔣介石秘錄 5：青年士官時代〉（東京：サンケイ新聞社出版局，1975）；汪偉華，〈試論從孫中山逝世至北伐前之蔣介石〉，《江西社會科學》，2003 年第 4 期，頁 120-123；胡震亞，〈蔣介石早年性格特徵及形象重塑述評〉，《民國檔案》，2002 年第 4 期，頁 50-58；耿易，〈蔣介石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功與過〉，《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89 年第 4 期，頁 22-28；莫永明，〈評辛亥革命前後的蔣介石〉，《學術月刊》，1989 年第 6 期，頁 76-80。

二、辛亥革命時期：自我定位的摸索

根據蔣中正的自述，他於 1906 年（光緒 32 年）開始接觸革命黨人，首先結識陳其美，再由陳引見，在日人宮崎滔天家中拜會孫中山；⁶其後，於 1908 年（光緒 34 年）加入同盟會，介紹人爲陳其美，保證人則是周淡游與莊新九。⁷然直到 1913 年（民國 2 年），蔣才單獨蒙孫氏接見，並受其賞識。⁸

以上是蔣中正加入革命黨活動的簡歷。不過，蔣中正爲何能從一介普通革命黨員，逐漸躍升爲可參與決策，能單獨與孫中山議事的幹部？此一身分的轉換過程，是研究蔣中正革命生涯的首要課題。特別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對蔣中正何時見到孫中山、爲何能得到孫賞識，可謂眾說紛紜，未有定論。⁹有鑑於此，本節擬以蔣中正的早年生活歷程爲經，所處時勢潮流爲緯，勾劃蔣中正的成長軌跡，同時反映大時代的風貌。

1906 年，蔣中正以 19 歲弱冠之年遠赴東京深造，此一舉動不僅表示蔣對近代文明的仰慕，也顯露當時的風尚。當時憂國志士的共同體認，是傳統中國

⁶ 〈蔣中正日記：民國 6 年前事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原件，以下略收藏機構）。

⁷ 〈蔣中正日記：1929 年 8 月 31 日〉。

⁸ 蔣中正，〈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二週年紀念會告全國青年書〉（1940 年 7 月 9 日），收入秦孝儀編（以下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卷 31，頁 196；蔣中正，〈我們復國的精神志節和建國的目標方略：對第 9 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指示〉（1963 年 11 月 12 日-22 日），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8，頁 265。

⁹ 例如在董顯光所著《蔣總統傳》中，稱兩人第一次見面係在 1910 年（宣統 2 年），地點爲日本東京。孫見到蔣後，對介紹人陳其美說：「我們的革命運動中正需要這樣的人。」在此，將 1910 年視爲兩人首次見面，而兩人一見如故，孫對蔣的賞識不言可喻。持斯論點者，尚有大陸學者周盛盈、劉紅以及日本產經新聞等著。除了 1910 年之說外，另有謂 1913 年 12 月，地點仍爲日本東京。持此論者爲大陸學者崔曉忠、宋平、嚴如平、鄭則民以及美國學者 Jay Taylor 等人。參見董顯光，《蔣總統傳》（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輯 1，頁 14-16；周盛盈，《孫中山和蔣介石交往紀實》（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頁 7；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蔣介石秘録 2：革命の夜明け》（東京：サンケイ新聞社，1975），頁 63-64；劉紅，《蔣介石大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1），上冊，頁 65-66；崔曉忠，《青年蔣介石》，頁 120-121；宋平，《蔣介石：總司令、委員長、總裁、主席、總統》（香港：利文出版社，1988），頁 24；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36；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70.

文化已不足以抗衡西方，中國惟有以日本為師，借重日本吸取西方文化的經驗，以謀國家改造，始可避免亡國亡種之禍。這份自覺引發了東瀛留學熱潮，也啟動了蔣遠赴日本留學的決心。

不過，這段留學經歷不及一年。蔣4月赴日，年底就返國，只因他志在學習軍事，當得知中國學生要入日本軍隊受訓，必須由清廷陸軍部保送，否則概不收容後，便毅然結束在東京清華學校的學習，整裝回國。¹⁰但是這趟短暫的東瀛之旅，卻是日後他投身革命陣營的關鍵。在此期間，他因鄉親周淡游的介紹，得以結識陳其美，¹¹爾後更藉由陳其美的引薦，能夠面見孫中山，¹²為他往後的革命生涯掀起序幕。

回國後，翌年春天，蔣中正即考取清廷於直隸保定新創設的「通國陸軍速成學堂」，並以該校在籍學生身分，於1908年被清廷甄選為留日陸軍學生，派遣至東京振武學校接受陸軍軍官的預備教育。¹³根據日本軍官教育的培養流程，在進入士官學校接受正式軍官教育之前，必須有部隊的實習經驗。因此，振武學校的中國軍事留學生，在完成三年基礎教育後，必須下部隊實習一年，方可進入士官學校繼續深造。士官學校的基礎課程是一年半，完成學業後，將以實習軍官身分歸建原部隊，再經半年實習，才可獲任命為少尉軍官。整體的軍官培訓過程，至此才告一段落。¹⁴

因此，若按照正常程序，蔣中正得在日本進修六年，才可完成既定的學習課程，成為合格的軍官。不過，就在蔣中正完成振武學校課業，被分發至部隊實習屆滿前的一個月，辛亥革命爆發，他乃回國投身革命，從此中止在日本的

¹⁰ 蔣中正，〈對從軍學生訓註〉（1944年1月10日），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0，頁315。

¹¹ 姚輝、朱馥生，《陳英士評傳》（北京：新華書店，1989），頁20。

¹² 根據蔣中正自述，見面場合是在宮崎滔天的家中，惟當時兩人並沒有互動；而兩人有個別談話的機會，則是到1913年討袁戰役以後。參見〈蔣中正日記：民國6年前事略〉；蔣中正，〈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二週年紀念告全國青年書（1940年7月9日）〉，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1，頁196；蔣中正，〈我們復國的精神志節和建國的目標方略：對第9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指示〉，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8，頁265。

¹³ 黃自進，〈蔣中正先生留學日本的黃金歲月〉，《近代中國》，期147（2002年12月），頁29。

¹⁴ 黃自進，〈蔣中正先生留學日本的黃金歲月〉，《近代中國》，期147，頁36。

學業。¹⁵易言之，蔣中正並沒有就讀士官學校，而他的正式學歷只是振武學校畢業，等於是完成中學教育而已。¹⁶

相較於課業的平庸表現，¹⁷蔣中正對革命事業則是認真地投入。1908年，蔣以留日陸軍學生身分再度抵達日本，加入了同盟會。此後，他不時利用假期返國，直接投身上海的革命事業。¹⁸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又立即整裝回國，是同期 62 名實習生中，被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列名告發私自潛逃回國的三人之一。¹⁹這些史實，無異為蔣氏獻身革命的熱誠，提供歷史見證。

辛亥革命時期，蔣直接受命於陳其美，他首先擔任先鋒隊指揮官，赴杭垣運動新軍，旋率敢死隊百餘人自滬抵杭，參與規復浙江。1911年（宣統3年）11月4日，他親率敢死隊進攻浙江撫署，響應友軍攻擊軍械局及將軍署的活動。是日，順利攻克杭州，蔣中正有率先起義，虜獲巡撫增韞之功。浙省既下，蔣返滬報命於陳其美。是時上海已先一日為陳所規復，陳被推為滬軍都督，蔣遂被任名為滬軍第5團團長，留在上海為滬軍練兵。²⁰

不過，蔣中正任軍職的時間並不長，主要原因在於他是轟動一時的「刺陶案」的製造者。1912年（民國元年）1月14日，光復會首領陶成章遭到暗殺，蔣中正日記中補述其事道：

當革命之初陶成章亦相繼回國，即與英士相爭，不但反對英士為滬軍都督而顛覆之，且欲將同盟會之組織根本破壞，且欲將光復會代之為

¹⁵ 黃自進，〈蔣中正先生留學日本的黃金歲月〉，《近代中國》，期147，頁56。

¹⁶ 按明治時期的教育體制，小學6年，中學5年，高等學校3年，大學3年。

¹⁷ 除了未能順利完成士官學校學業外，蔣中正在振武學校的在校成績與部隊實習成績也皆乏善可陳。蔣中正是在1910年11月畢業，三年振武學校的總成績是68分。蔣氏所修畢的科目除日文閱讀、會話、作文3科以外，還有算數、代數、幾何、地理、歷史、物理、化學、生理、圖學、畫學、典令、體操等12科。此15科學術科目再加計操行為總成績，蔣於同期62名畢業生中，名列55。參照〈振武學校學期試驗成績〔績〕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原件）。

¹⁸ 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未公開發行，1978），卷1，頁16-17。

¹⁹ 其他兩人為張群、陳星樞。「陸軍大臣男爵石本新六發外務大臣子爵內田康哉宛の通牒」（1944年11月8日），〈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陸軍學生の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陸普第3797號，原件），卷5。

²⁰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頁17-18。

革命之正統，必欲將同盟會領袖孫黃之歷史抹煞無遺，并謀推戴章炳麟以代孫先生。嗚呼！革命未成，自起糾紛，陶之忌刻成性，竺紹康未死之前，嘗謂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實此人也，爾當留意之！惜竺於此時已逝世，而其言則余初未忘。及陶親來運動余反對同盟會，推章炳麟為領袖并欲置英士於死地，余聞之甚駭且悲，陶之喪心病狂已無救藥，若不除之，無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當時之大局也。蓋陶已派定刺客，以謀英士，若果令計得行，則滬軍無主，長江下游必擾亂不知所之；而當時軍官又皆為滿清所遺，反覆無常，其象甚危，長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為滿清與袁賊所收復，如此則辛亥功敗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權，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此為辛亥年革命成敗最大之一關鍵。余於此特記述之，但出於一片公忠之至誠，決非對人有所好惡，此為余對革命歷史惟一深切之事，余因此自承其罪，不願累英士，乃即辭職東遊。²¹

可見「刺陶案」確為蔣一手主導。「刺陶案」引發的衝擊，可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於陶案發生翌日發給滬軍都督陳其美的電文中，一窺究竟：

萬急，滬軍陳都督鑒：閱報載光復軍司令陶成章君，於元月十四號上午兩點鐘，在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被人暗刺，刺中頸、腹部，兇手逃去，陶君遂於是日身死，不勝駭異。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餘年，奔走運動，不遺餘力，光復之際，陶君實有鉅功，猝遭慘禍，可為我民國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滬，豈容不軌橫行，賊我良士。即由滬督嚴速究緝，務令兇徒就獲，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靈，洩天下之憤。切切。總統孫文。²²

除了孫中山公開命令嚴速究緝之外，陸軍總長黃興也於 17 日向陳其美拍發電報表示：

上海陳都督鑒：聞陶君煥卿被刺，據報云是滿探，請照會法領事根緝

²¹ 〈蔣中正日記：民國 6 年前事略〉。

²² 《民立報》，1912 年 1 月 17 日。

嚴究，以慰死友，並設法保護章太炎君為幸。黃興叩。霰²³

此外，還有浙江都督府、滬軍都督府、浙江共和促進協會等相關機構及民間團體，懸賞獎金以期緝拿兇手。²⁴從中央政府到地方行政首長的一連串相繼表態，具體反映刺陶案所引發的社會迴響。1月21日，光復會於上海為陶成章舉行追悼會，出席者多達四千餘人。²⁵1月30日，陶的骨灰運回杭州，在杭州舉行的追悼會，到會者竟有萬人之眾。²⁶因陶被視為殉道者，眾人義憤填膺。1月14日，事發不久，和蔣一起行兇的王竹卿，便被浙江嘉興當地的光復會會員僱人殺死。²⁷既成眾矢之的，避禍東瀛，反而成為蔣中正最好的選擇。

不過，避居東瀛以後的蔣中正，並未關門蟄居，反而謀定後動，再度出發，復於東京創立《軍聲雜誌》，著意喚醒國人注意國防安全。新雜誌社址設於東京，在上海、北京、漢口等地皆設有發行機構，於1912年11月1日正式創刊。²⁸蔣中正親自撰寫發刊詞：

我國此次之革命，名為對內，實為對外。……對外問題最重要者為軍事，……吾國人今日對於軍事所最宜注意者；一曰鼓吹尚武精神也。二曰研究兵科學術也。三曰詳議徵兵辦法也。四曰討論國防計劃也。五曰補助軍事教育也。六曰調查各國軍情也。……以上諸綱，均為軍事之關鍵，而列強所恃以雄視世界者，其大端實亦不外乎此。本社同人編輯軍聲，將欲揭破各國之陰謀。而噤音瘖口，警告國人以未雨綢繆之計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²⁹

此外，《軍聲雜誌》還在上海《民立報》刊登廣告，說明「雜誌社之體制，

²³ 《民立報》，1912年1月20日。

²⁴ 《民立報》，1912年1月20日。

²⁵ 《民立報》，1912年1月22日。

²⁶ 《民立報》，1912年1月31日。

²⁷ 楊天石，〈蔣介石為何刺殺陶成章〉，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80。

²⁸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全譯本第4冊》（台北：中央日報社，1975），頁61-62。

²⁹ 蔣中正，〈軍聲雜誌發刊詞〉（1912年11月1日），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5，頁2-4。

仿效日本偕行社記事之例，而略加變通。」³⁰所謂《偕行社記事》，是指偕行社所發行的機關報。偕行社成立於 1877 年（清光緒 3 年），是一個以日本陸軍現役將校級軍官為成員所組織成的聯誼社團，因此，《偕行社記事》並不是一般性雜誌，而是一本兼負研究軍事及宣傳軍政政令的雜誌。³¹因而以《偕行社記事》為範例的《軍聲雜誌》，成立目的除了表面上所宣揚的軍事戰略之研究外，喚醒國民憂國意識、團結有志之士、擴張人際網絡等意圖，亦甚明顯。

蔣中正先後在《軍聲雜誌》發表了五篇文章，在第一篇〈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文中，首先主張革命後的新政府，急務莫過於確立國防方針。其次，他認為按中國的國力，無法同時發展海陸軍，因而主張以十年之力，全力發展陸軍，採守勢國防；並主張以清廷原本 1 億 2 千萬的軍費支出為基準，培養 60 萬精兵。³²其次又發表〈軍政統一問題〉，主張軍政必須統一，在全國範圍內分設各級管區，層層節制。³³接著發表〈巴爾幹戰局影響於中國與列國之外交〉，認為巴爾幹半島的戰爭雖已告一段落，但戰後領土的重新劃分，不僅涉及參與戰事的諸小國切身利益，也關乎歐洲各列強的勢力重整，因而巴爾幹的發展，值得中國重視。尤其因巴爾幹問題而導致英、德、意、奧諸國與俄國交惡，更是中國可因勢利導的外交良機，以求在亞洲孤立俄國。³⁴

其後，蔣中正又連續發表兩篇關於中國邊疆問題的文章。第一篇是〈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主張在西藏及蒙古的主權分別遭受英國及俄國侵犯時，為避免腹背受敵，「征藏不如征蒙，撫俄不如撫英」，認為西藏爭議不妨暫時擱置，應集中全力征討蒙古，用武力奪回中國在蒙古的既定主權，對俄國更應有不惜一戰的決心。³⁵第二篇〈征蒙作戰芻議〉，認為「征蒙為討俄之代名詞」，

³⁰ 《民立報》，1912 年 11 月 20 日。

³¹ 淺野和生，《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陸軍》（群馬縣：關東學園大學，1994），頁 86。

³² 蔣中正，〈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1912 年 7 月），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5，頁 23-36。

³³ 蔣中正，〈軍政統一問題〉（1912），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5，頁 5-10。

³⁴ 蔣中正，〈巴爾幹戰局影響於中國與列國之外交〉（1912），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5，頁 11-15。

³⁵ 蔣中正，〈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1912），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5，頁 16-22。

因而真正的作戰對手為俄國。鑑於俄國為泱泱大國，領土跨越歐亞大陸，平時就擁有雄兵 150 萬，戰時更可動員到 230 萬兵力；而中國集全國之力也不過 40 餘萬人，對俄可用之兵最大極限約為 20 萬人。因此，蔣中正的結論是，集中兵力於庫倫，然後審時度勢，切忌魯莽冒進。³⁶

從蔣中正發表在《軍聲雜誌》的五篇論文觀之，他提出論述的主要內容，對內主張軍政統一，對外主張維護國權。與他主政後的治國方針相互對照，即可發現此時的蔣中正，對中國何去何從已有初步定見。他對國際局勢的剖析，也值得注意。他認為中國的外患來自於英、俄、日三國，其中，英國注重經濟利益，俄、日有領土野心；其次，再論俄、日兩國對中國領土侵略政策的特色，認為俄國在東亞的經營是「分割有心而經營不及」、「恫嚇太過而實行無力」，反之，日本經營滿洲卻是「補苴完善，不驚虛名，而崇實行」。³⁷這些看法，和他發表的其他論述正相互呼應，他認為英國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而俄國雖垂涎中國領土，但因四處征戰，在遠東的經營上則顯得力不從心。這是他在邊疆問題上，主張撫英抗俄的主要理由之一。至於對日本經營滿洲的投入及企圖心的旺盛，蔣中正一向引以為憂，認為滿洲已成日本的禁臠，在中國無完全準備之前，不應輕易嘗試解決滿洲問題。這一想法，在蔣中正 25 歲時已具雛形，且於日後處理東北問題時奉為圭臬。³⁸

《軍聲雜誌》只辦了四期，就因資金不繼而停刊。在經營雜誌也不如意的情況下，蔣中正萌意赴德國深造，繼續鑽研軍事學。因此，他於 1912 年年底告別東京，回到浙江奉化老家。翌年 6 月，當他準備經上海赴德國留學時，陳其美告以舉事在即，留下籌畫討袁事宜。³⁹7 月 22 日，上海響應討袁革命，發

³⁶ 蔣中正，〈征蒙作戰芻議〉（1912 年 12 月），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5，頁 37-55。

³⁷ 蔣中正，〈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5，頁 25-26、30。

³⁸ 黃自進，〈蔣介石と滿洲事變：「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の對日政策の原點〉，《法學研究》，卷 75 號 1（2002 年 1 月），頁 377。

³⁹ 李勇、張仲田，《蔣介石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頁 24-25。

動江南製造局戰役，就是出於蔣中正的構思。⁴⁰當第一波戰役於 7 月 23 日失敗，蔣中正特於 28 日親赴龍華策反第 93 團，也就是辛亥革命期間蔣曾擔任團長的第 5 團，在得到約一營的舊屬支持之下，蔣親率舊部，與友軍鈕永建的部隊再度會攻江南製造局，激戰兩日，終無法建功，只得撤離上海，避居吳淞、寶山一帶。⁴¹

上海戰役失敗後，蔣中正曾與張靜江趕赴南京，原欲助柏文蔚一臂之力，以求堅守南京。⁴²但面謁柏時，覺得柏「心志形態，亦極不定」，⁴³因而又回上海，於 9 月 1 日偕妾姚素秋亡命日本。⁴⁴

在蔣中正赴日前，孫中山、黃興、胡漢民、李烈鈞等革命領袖，早已陸續抵達日本。眾所周知，爾後孫中山在東京籌組中華革命黨，為革命再起爐灶；惟中華革命黨甫值草創，未脫地下組織色彩，相關記載本來不多，有關蔣中正的記述更是闕如。所幸，孫中山自 1913 年 8 月 9 日抵達日本神戶，至 1916 年（民國 5 年）4 月 27 日離東京轉赴上海止，日本警方每日均有完整的監視紀錄。其中有 40 筆是蔣中正拜訪孫中山的會面紀錄，針對蔣個人的紀錄也有 22 筆，涵蓋地區除日本本土外，尚包括哈爾濱、上海、杭州等地的領事報告。這些日本政府的檔案紀錄，不僅可以適時填補中文史料的空白，更可為蔣中正與孫中山的實際往來情況，提供最真實的見證。

如前文所述，蔣中正自述得到孫中山單獨接見是 1913 年，至於會面的時間及地點，則無詳述。關於兩人交往的細節，反而得仰仗日本警方的監視紀錄。

⁴⁰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全譯本第 4 冊》，頁 68。

⁴¹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全譯本第 4 冊》，頁 70-72。

⁴² 南京的討袁軍原本是由黃興領導，於 7 月 15 日起義，但因內部整合不易，黃興於 7 月 29 日離京，原江蘇都督程德全因而趁機宣布取消獨立，擬投效袁世凱陣營。不料，駐守南京的第一師在黨人何海鳴運動下，於 8 月 10 日復宣布反正，南京再度宣布獨立。柏文蔚因而於 8 月 20 日趕赴南京，並接任都督。不過，柏只堅持到 26 日就離京，而南京是在 9 月 1 日陷落。蔣中正到南京的時期，應是 8 月 21 日至 25 日之間。

⁴³ 〈蔣中正日記：1929 年 8 月 31 日〉。

⁴⁴ 「長崎縣知事李家隆介發外務大臣男爵牧野伸顯宛の報告書」（1913 年 9 月 1 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原件，以下略收藏機構），卷 7，高秘特收第 1323 號。

根據該監視紀錄，孫中山與蔣中正第一次會面是在 1914 年（民國 3 年）6 月 12 日。⁴⁵易言之，當 1913 年 9 月 1 日二次革命初敗，蔣中正亡命日本時，還不能得到孫中山的青睞，獲其賞識已是十個月以後的事。

在這段期間，蔣中正於 1914 年年初奉命回到上海，準備再次討袁，攻佔上海。按計畫，起事隊伍三路進攻上海，由蔣兼第一路司令。不料計畫為淞滬鎮守使鄭汝成偵悉，設於小沙渡的司令部於 5 月 30 日被抄，起出槍械、文件等物品，同志也因而相繼被捕遇難。⁴⁶因此，蔣中正遭到袁世凱政府的通緝，謂「此次謀亂，係蔣介石代表孫文主持一切，偽示地圖及款項均由蔣介石受孫文偽令給付」。⁴⁷

由於組織被破壞，再加上蔣中正本人一度也因黨內同志出賣，險遭逮捕，為求避險，只得再度遠走東京。不過，此一經歷反而是蔣中正開始受到外界注目的重要契機。辛亥革命時期或二次革命期間的蔣中正，隸屬於陳其美之下，雖勇於任事，畢竟聽命於人，無法獨當一面，沒有全國性的知名度。但這次事件，袁世凱政府對蔣中正所發布的通緝令，即將他視為孫中山嫡系。1914 年 7 月 10 日，日本上海總領事有吉朋針對這次討袁事件，向東京的外務省本部提出以下報告：

浙江派主要是由浙江出身者所組成的集團，是活躍在上海的革命黨派的中堅，比較團結，也比較穩健。原首領逃亡日本後，由蔣介石（前陸軍少將）負責統籌，駐守於當地法租界。今春起奔走於南京、杭州之間，企圖策動同志或軍隊。蔣介石以他的浙江派為班底，再加上部份的安徽派，在閘北小沙渡設置秘密活動據點，計劃於五月三十日舉事。但事前遭閘北警察署察知，事跡敗露，部份同志被捕，蔣介石也於六月上旬逃到日本。目前當地的代表人是姚勇忱。⁴⁸

⁴⁵ 「孫文ノ動靜」（1914 年 6 月 13 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12，乙秘第 1101 號。

⁴⁶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香港：龍門書店，1965），頁 30-31。

⁴⁷ 〈政府公報命令：1914 年 6 月 15 日〉。

⁴⁸ 「在上海總領事有吉朋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 年 7 月 10 日），〈各國

這份報告不僅指出蔣中正是此次討袁事件中的領導人，也指出他是陳其美在上海地區的代理人。也就是說，蔣中正成爲上海地區革命陣營中的新起之秀，經由此次起義，除了被敵對的北京政府認同外，也開始受鄰國政府注目。

北京政府及日本政府對蔣中正的重視，只是反映討袁事件中蔣身爲領導人的客觀事實。而革命陣營內部對蔣中正態度的變化，則更早於討袁事件。在孫中山的監視紀錄中，第一次出現蔣中正的名字是在 1914 年 3 月 15 日。當時有一位革命黨人盛碧潭帶著蔣中正的介紹信，求見於孫中山，即獲接見。⁴⁹當蔣中正的介紹信已等同於可直接面謁孫中山的通行證時，蔣中正本人要見孫中山，自然是水到渠成。

按日期來說，蔣中正在東京第一次見到孫中山，應是上海討袁失敗而再度亡命東瀛時。從蔣中正介紹信的出現，到蔣可以面謁孫中山，直接與總理對話，負責上海的討袁事件應是關鍵。不過，除了上述客觀事實的陳述以外，蔣中正自己的主觀認知，也提供一些線索。1943 年（民國 32 年）7 月 26 日的蔣中正日記中，突然有這樣一則記載：

看總理致稚暉先生書，益憤陶成章之罪不容誅，余之誅陶，乃出於爲革命爲本黨之大義，由余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經由此事而起，但余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⁵⁰

在孫中山致吳敬恆先生信函中，提到與陶成章相關者，前後共有七封。日期是從 1909 年（宣統元年）10 月 30 日至 1910 年（宣統 2 年）1 月 3 日，通信內容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爲向吳敬恆舉證澄清，所謂他將南洋華僑及日人給同盟會的捐款中飽私囊的指控，純爲陶成章虛構；⁵¹第二階段期盼吳敬恆能

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12，機密第 59 號。

⁴⁹ 「孫文ノ動靜」（1914 年 3 月 16 日），同上，卷 10，乙秘第 647 號。

⁵⁰ 〈蔣中正日記：1943 年 7 月 26 日〉。

⁵¹ 孫中山，〈在倫敦將去美國時致吳敬恆函〉（1909 年 10 月 30 日），收入秦孝儀編（以下略），《國父全傳》（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9），冊 4，頁 95-98。

具文反駁陶成章及章炳麟對他的不實指控；⁵²第三階段則希望吳敬恆能將劉師培揭露章炳麟私通清廷的筆跡照片寄與他本人，並期許吳能繼續為文替他闢謠。⁵³

從通信內容就可得知，事件的起因在於陶成章質疑孫中山的人格及領導風格。他列舉的具體事件，就是指自 1907 年（光緒 33 年）至 1908 年間，同盟會在粵桂滇邊所發動的五次起義。⁵⁴陶成章認為，孫中山利用起義事件廣向海外華人及日人籌謀資金，但對募款所得一向是收多報少，差額就中飽私囊。此外，對於參與起義的同志，一旦沒有利用價值，便棄如敝屣。因河口之役失敗，退入安南，又被法國當局遣送出境的原革命軍將士，被遣往新加坡後，生活無著，就是最具體的例證。⁵⁵

當時陶成章的主要訴求是：孫中山辭去同盟會總理職，並由章炳麟接《民報》總編輯一職。他先聯絡江、浙、湘、楚、閩、廣、蜀七省在南洋辦事人，羅列孫中山罪狀 12 條及善後辦法 9 條，然後親赴東京，要求同盟會庶務部長黃興訴諸公論，公審孫中山。⁵⁶由於黃興不肯處置，陶成章就以〈南洋革命黨人宣布孫文罪狀傳單〉為題，投稿於《南洋總匯新報》，⁵⁷而章炳麟也發表《偽民報檢舉狀》，全面向孫中山領導地位挑戰。⁵⁸

1909 年陶成章對孫中山領導地位的挑戰，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案件，而是陶成章與章炳麟聯手，欲向革命陣營奪取領導權的第一步。兩人欲圖公審孫中

⁵² 孫中山，〈甫到美國致吳敬恆函〉（1909 年 11 月 12 日）；〈致吳敬恆請於新世紀評論日華新報破壞黨事謬論函〉（1909 年 12 月 4 日）；〈致吳敬恆再請於新世紀評論日華新報破壞黨事謬論函〉（1909 年 12 月 13 日），皆收入《國父全傳》，頁 98-102。

⁵³ 孫中山，〈致吳敬恆請寄章太炎劉光漢同謀之筆跡照片為證函〉（1909 年 12 月 16 日）；〈致吳敬恆告通訊住址函〉（1909 年 12 月 16 日）；〈請在新世紀多發闢之言致吳敬恆函〉（1910 年 1 月 3 日），皆收入《國父全傳》，頁 103-105。

⁵⁴ 五次起義，是指潮州、惠州、欽廉、鎮南、河口五役。

⁵⁵ 陶成章，〈南洋革命黨人宣布孫文罪狀傳單〉，收入湯志鈞編（以下略），《陶成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69-177。

⁵⁶ 魏蘭，〈陶煥卿先生行述〉，收入《陶成章集》，頁 433。

⁵⁷ 湯志鈞，〈陶成章年譜（初稿）〉，收入《陶成章集》，頁 489。

⁵⁸ 魏蘭，〈陶煥卿先生行述〉，收入《陶成章集》，頁 433。

山不成，翌年 2 月，又重組光復會於東京，章炳麟自任會長，陶成章爲副會長，並在東南亞的英屬及荷屬殖民地廣設分會，與同盟會分庭抗禮。⁵⁹

前述陶、章反孫事件，蔣中正並未參與；可是，辛亥革命時期光復會欲圖在江浙地區爭奪領導權一幕，蔣中正卻是親身經歷。辛亥革命時期，上海光復，除了同盟會的力量以外，光復會動員上海地區軍警反正，也居功甚偉。⁶⁰是以，當 1911 年 11 月 6 日，滬軍都督府成立，陳其美被推爲都督；光復會爲謀對抗，遂於 11 月 9 日在吳淞另成立軍政府分府及光復軍總司令部，由李燮和任總司令，宣布只承認蘇州軍政府爲全省的軍政府。⁶¹

除了在上海另立軍政府以外，反對黃興出任大元帥，對孫中山重提「南洋籌款」舊事，以及繼湯壽潛謀取出任浙江都督等一連串與同盟會爭鋒事，陶成章更是無役不與，⁶²對同盟會所造成的傷害，更甚於 1909 年之舉。因而蔣中正正在重溫舊事時，仍認爲當年刺陶是順天應人的義舉。值得吾人再三玩味的是，蔣中正早年對刺陶案的回憶，僅強調純粹是爲了革命公義，而非個人恩怨。不過，到 1943 年，他除了重覆當年的刺陶動機外，還多記錄了一項心得，即認爲刺陶案是他能夠得到孫中山賞識的重要關鍵。此一心得是早年的蔣中正無法體會，直到自己出任國家領導中樞多年以後，將心比心，才能體悟的組織運作之道。也就是說，惟有長年擔任領導人的經歷以後，方能體會忠誠難求。尤其此一忠誠是針對個人，而非忠於組織，更能迎合領導人之所需。

陶成章原爲同盟會大老，爾後雖與同盟會分道揚鑣，重組光復會，但仍以「光復漢族，還我山河」爲號召，⁶³並未背離革命大道。辛亥革命後，陶出任浙江軍政府總參議，⁶⁴對江浙革命大業的底定，有汗馬功勞。因此蔣殺陶，不

⁵⁹ 湯志鈞，〈陶成童年譜（初稿）〉，收入《陶成章集》，頁 489。

⁶⁰ 陶菊隱，〈上海光復前後的李燮和〉，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辛亥革命七十週年：文史資料紀念專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97-100。

⁶¹ 《民立報》，1911 年 11 月 17 日。

⁶²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頁 4-7。

⁶³ 光復會的誓詞爲：「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

⁶⁴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頁 6。

是因他反革命，而是因他與陳其美爭地盤。在陳為孫嫡系，保陳就視同保孫的前提下，蔣的果斷決行，對鞏固孫的領導中心，有最直接的貢獻。然而，黑夜行兇本就駭人聽聞，再者，行刺對象又是革命元勳，蔣的行徑只能用幫派角度來解讀，非廟堂之士所應為。不過，對處於一個轉型時代的革命領袖而言，當與政敵之間沒有一個可調整相互利益衝突的健全機制時，只能利用非正式手段扳倒政敵。因而這種非常手段，實有不便公開啓齒的難處。此時若有屬下能體恤領袖，主動為領袖分憂，又能主動為領袖擋禍，事後三緘其口不表功者，實屬難得之至。對孫中山而言，蔣的可貴亦在於此。這是 25 歲的蔣中正未曾體會的道理，直到知天命的 56 歲時，才能領悟其間奧妙。不過，這些事只能意會，不能言傳，蔣中正只有將感觸留在日記上，從未向外人提及。

三、中華革命黨時期：革命理論實踐的起點

如前所述，蔣中正直到 1914 年 6 月 12 日，才得以親見孫中山。可是，根據日本警方對孫中山的監視紀錄，可知此後雙方見面次數即相當頻繁，在這一年中就有 29 次之多；其中，8 月份見了 24 次面。⁶⁵相見如此頻繁，無非是有要事商量。以下，就以蔣中正參與核心業務由淺入深的過程為線索，探討他在中華革命黨時期崛起的歷程。

中華革命黨於 1914 年 7 月 8 日召開成立大會。在此之前，1913 年 9 月 27 日，孫中山即已在日本吸收同志宣誓參加中華革命黨。⁶⁶蔣中正在 1913 年 10 月 29 日入黨，入黨誓約為 102 號，⁶⁷名列最早一批的入黨者。他在 1914 年 5 月上海所籌備的起義，也是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第一次企圖在中國國內發動反撲的軍事行動。上海起義失敗，蔣再度流亡日本，除了立即獲得孫中山接

⁶⁵ 參照〈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12-13。

⁶⁶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頁 150-151。

⁶⁷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全譯本第 4 冊》，頁 84-86。

見以外，並開始籌辦進行另一次計畫。

同年 7 月 6 日，蔣中正再度啓程返國，在 7 月 10 日抵達哈爾濱，同行者有滿洲鐵路公司的山田純二郎及同志丁人杰。根據日本駐哈爾濱代理總領事川越茂致日本外務大臣的報告，認為蔣中正此行的目的是在策動軍隊。報告的主旨如下：

今年四月起，北京政府開始將黑龍江省巡防隊改編成新式陸軍，為此紛擾屢起。儘管如此，當局仍然強行改編，結果巡防隊有多位士官及士兵因此被逼提前退伍（從五十一營緊縮為十八營）。這些人原本是現任旅團長巴英額及獨立旅團長英順的部下；由於將士們憤恨難消，巴、英兩旅團長的情緒，自然也會波動不平。巴旅團長原本是馬賊出身，性情暴戾，更使得革命黨人有機可趁。原計畫是先遊說巴英額，而後再遊說英順，企圖將其納入孫文陣營，待他日有事時，便可率領新舊部舉兵。而山田一行人為了執行上述密旨，首先派遣本地某人，帶著密旨到黑龍江省巴彥州（距松花江左岸約三十里）巴英額的防區，預計等使者說服巴英額後，山田再出面和巴英額會商，現在正是靜候使者歸來之時。至於有關巴旅團長舉兵一事，山田本人似乎尚未有具體計畫，但可以想像是要等到八月底北滿一帶高粱成熟，容易取得糧食，行動也比較自由的時候。此外，若果真要舉兵，為避免俄國政府有干涉之藉口，山田方面似乎已有對策。⁶⁸

繼這份報告以後，日本駐哈爾濱代理總領事又於 8 月 5 日再度彙報山田及蔣的行蹤，指出山田這段期間曾一度前往齊齊哈爾，而蔣與丁人杰則前往長春；山田在 26 日，蔣、丁兩人則於 27 日相繼回到哈爾濱。至於擬策動的巴英額團長，雙方至今仍未見面，但是代表巴團長出面交涉的曲營長，於 27 日來到哈爾濱。關於上述代理人與山田等人之間的交談概要，山田曾隱密地透露給

⁶⁸ 「在哈爾濱總領事代理領事官補川越茂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 年 7 月 24 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12，機密第 36 號。

根津翻譯員，內容如下：

曲營長將孫文託當地使者交給巴旅團長的密函交還給山田。這次黑龍江省巡防隊改編的結果，巴英額、英順等雖然都升任為旅團長，但因為部下多半被裁汰，所以兩人的榮銜也只是一時的。等到此次裁汰兵解散後，應該還會進行第二次的裁汰，兩人自忖屆時將會被免職，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進而舉兵，參與孫文的計畫，南下攻擊袁軍；即使不幸全軍覆沒，至少也有「義舉」之名。為此，他們派遣密使赴吉林，與該地同僚共商南下之大計。此外，巴、英旅團長同時也考慮將家人暫遷至大連。對巴、英兩人擬將家人暫遷大連之計畫，山田不置可否，只表示將利用任職滿鐵之便，保障其安全。至於與吉林同僚方面的聯絡、舉兵，就需等待孫文的指示，此刻雙方會面首在確保巴旅團長是否有意舉兵而已。山田並表示巴果真允諾舉兵的話，軍費的支出由孫文負責調度，在合適的時機就可以提交。曲營長說軍費的籌措是非常重要的，否則舉兵南下時，糧食的補給只得靠掠奪才行。至於軍費要如何籌措，非得由巴自己來哈爾濱與山田進行具體的協商，或是他自己與山田等前往東京，與孫文直接會商。曲營長於二十八日回到了巴彥州。⁶⁹

在這份報告中，日本領事也提及另一訊息，指陳上個月北京政府經上海匯來約四十萬元，給本地正金銀行、俄亞銀行及香上銀行的黑龍江省省政府帳戶。據查，這筆錢是用來作為軍隊遣散費之用，既然被裁汰士兵有撫卹金可領用，山田等人的使命自然不易達成；孫文這次的策動兵變計畫，只落得白費心機。⁷⁰

與日文史料相較，中文史料留下許多空白。例如蔣中正於 1916 年 5 月 26 日撰寫的〈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畫及事略〉，只提到「當時接東省同志

⁶⁹ 「在哈爾濱總領事代理領事官補川越茂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 年 8 月 5 日），同上，卷 12，機密第 38 號。

⁷⁰ 「在哈爾濱總領事代理領事官補川越茂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 年 8 月 5 日），同上，卷 12，機密第 38 號。

之報，有巴英二統領者，請其速往主持，公以在東事繁，不克西歸，乃命中正與丁景梁至哈爾濱齊齊哈爾等處，先往視察。據報不確，故未親赴其地。未幾歐戰突起，乃命中正回東，以謀東南之進行也。」⁷¹蔣在 1931 年（民國 20 年）2 月 21 日的日記中，也曾回顧這段經歷說：「與丁景梁同志赴東三省哈爾濱，當時東省黨員寧孟言等來報告，其於吉、黑二省之軍隊似乎皆已成熟，祇要余一到即可發動，……居留月餘，其消息日遠，乃知其志在騙錢。」⁷²

將中、日文史料對照，兩者的訴求重點雖然不一，卻可相互呼應，互為補充。中文史料反映了蔣中正個人的主觀認知，日文史料則是提供客觀史實的背景資料。蔣中正回顧整個事件，認為起義條件不成熟及主事者志在騙錢，因而失敗。日文史料則顯示雙方合作基礎薄弱，當初革命黨人的最初計畫，欲圖利用黑龍江省邊防軍對於北洋政府整編政策的不滿，趁機起事。易言之，邊防軍之所以有兵變的意圖，不是因為嚮往革命，而是對現狀不滿。然而當邊防軍獲悉可以從北洋政府得到一筆撫卹金後，也就不願鋌而走險，貿然發動兵變。

如前所述，蔣中正在 7 月 10 日抵達哈爾濱，至於何日離開東北，因資料限制，不得而知。按現有資料，確實可知的是，他於 8 月 16 日已回到東京覆命，並在同日面謁孫中山。值得一提的是，蔣於拜見孫中山之後，於 8 月 31 日離開東京，趕赴上海；⁷³逗留在東京的這 15 天裡，他只有兩天沒去看孫中山；雙方 13 天的會面次數，高達 24 次。⁷⁴也就是說，一天之中不止會面一次。

⁷¹ 蔣中正，〈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畫及事略〉（1916 年 5 月 26 日），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6，頁 7。

⁷² 〈蔣中正日記：1931 年 2 月 21 日〉。

⁷³ 根據東京地區的監視報告，蔣中正是於 8 月 31 日由東京的新橋出發，預定當日由橫濱出港赴上海。可是負責橫濱地區的監視報告，則說沒有他的出國紀錄。只是爾後福岡縣知事來報，確定他已於 9 月 3 日由門司出港前往上海。是以，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間蔣中正之行蹤，至今還有待查證，只是 8 月 31 日離開東京之事，不容置疑。「警視總監伊澤多喜男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 年 8 月 31 日），甲秘第 144 號；「神奈川縣知事石原健三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 年 9 月 4 日），高秘第 2299 號；「福岡縣知事谷田留五郎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 年 9 月 6 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13，高秘第 8300 號。

⁷⁴ 雙方未見面的兩天為 8 月 17 日、21 日；其餘十三天雙方會面次數統計如下：8 月 16 日 2 次，8 月 18 日 2 次，8 月 19 日 1 次，8 月 20 日 2 次，8 月 22 日 1 次，8 月 23 日 1 次，8 月 23 日 3

如 8 月 28 日當天，雙方會面 4 次：首先是上午 9 點到 11 點 5 分，蔣中正拜見孫中山；下午 3 點 50 分到 4 點 30 分，孫中山到陳其美的住處回訪蔣中正；當晚 7 點 50 分至 8 點 10 分，蔣中正又去見孫中山；不久，8 點 50 分至 9 點 30 分，蔣中正四度與孫中山會面。⁷⁵

從雙方見面次數的頻繁，即可揣想孫、蔣關係實由疏轉親。此外，根據日本的監視紀錄，蔣中正此次回上海的主要目的是爲了籌設革命軍總部，同行者還有陸惠生，行前還特地兌換了兩萬美金，日前才由美國匯到東京。⁷⁶活動地點從東北換到上海，緩衝期只有兩星期，期間與孫中山密期集會，行前又攜帶大筆資金，在在凸顯蔣中正的生涯規劃以及整個中華革命黨的革命方針，都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對此一新趨勢的發展，又應如何解讀，箇中緣由似乎還得從蔣中正的言行中找尋答案。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 7 月 28 日。蔣中正於 8 月 2 日針對大戰爆發後的時局觀測，撰寫了一份〈上總理陳述歐戰趨勢並倒袁計畫書〉。他認爲，奧國向塞爾維亞宣戰，將會牽動英、法、俄協約國與奧、德同盟之間的爭戰，在歐洲大國都將捲入大戰之際，勢必造成列強無暇顧及亞洲事務。因此，蔣中正認爲：「此次歐戰時期延長一日，即袁賊之外交勢力薄弱一日，……若吾黨不於此袁賊親西排東之外交失敗期內，乘勢急進，則時不再來，……吾知日本必於此期間，竭力伸張其勢力，以鞏固其將來在東亞外交上之地位，此其暗排袁賊之陰謀，所以不能不實施其明助我民黨之策略也。」⁷⁷

易言之，蔣中正認爲大戰爆發有利於倒袁活動。他從以下兩方面研判：首先，他認爲袁世凱是一個親西方的政治領袖，因而當西方列強忙於征戰歐陸之際，袁世凱已後繼無援。其次，認爲日本政府必會利用大戰所造成的亞洲權力

次，8 月 25 日 3 次，8 月 26 日 1 次，8 月 27 日 1 次，8 月 28 日 4 次，8 月 29 日 1 次，8 月 30 日 2 次。參見〈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13。

⁷⁵ 「孫文ノ動靜」（1914 年 8 月 29 日），同上，卷 13，乙秘第 1682 號。

⁷⁶ 「支那亡命者会合内容ニ関スル件」（1914 年 8 月 29 日），同上，卷 13，乙秘第 1678 號。

⁷⁷ 蔣中正，〈上總理陳述歐戰趨勢並倒袁計畫書〉，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6，頁 4。

真空，全面圖謀中國。在袁世凱沒有西方奧援，又得應付日本方面的各項壓力時，正是革命黨乘勢發展的大好時機。

至於如何發展，蔣中正認為「多方起事，不足分袁軍之兵力，徒墮本黨聲威，且喪本黨之元氣耳」，因而主張「集中一點，注全力，聚精銳」。他所謂的集中一點，是指浙江，認為浙江可「海主陸從，西守北攻」，在地理上雖不能直搗京師，但可獨立持久。再者，「浙江之軍人，猶屬昔時之革命分子，其思想，其宗旨，尚能較勝於他省」。⁷⁸

綜合考量這份計畫書與 8 月中旬後蔣中正的行蹤，便可想見，他的繁忙行程實是有脈絡可循。蔣中正會突然返回東京，逗留 15 天，與孫中山會面 24 次，旋又趕赴上海，而中華革命黨決定在上海籌設革命軍總部，並為此撥款兩萬美金給蔣中正，這些訊息都具體彰顯蔣中正的革命生涯與中華革命黨的革命方針，已有重要的調整。首先，他與孫中山密集見面，應有要事商量；其次，孫中山撥兩萬美金給他，乃為執行任務；最後，將革命軍總部設於上海，無非表示今後軍事行動的目標將訂於江、浙地區。也就是說，蔣中正在東北無功而返，並未影響孫中山對他的評價，反而更蒙青睞，箇中緣由，自然是因他上書為革命黨規劃出新的發展方向。孫中山肯定他的計畫，也認同他的領導能力，因此特撥款兩萬美金給他，望他為革命黨另闢蹊徑。

對蔣中正而言，這次上海之行有雙層意義：首先，這是他第一次受命於孫中山；以往他是陳其美嫡系，但此後他已能登堂入室。其次，這次上書深獲孫中山肯定，證實他除了擁有軍人的素質以外，也有規劃革命大局的能力；尤其是大戰一爆發，他就能針對大戰特質為革命規劃新的對應方略，充分展現他能文能武的特質。上海之行，使他從一個江浙地區的區域性幹部，一躍而成能規劃革命大勢，為革命黨獻計的明日之星。

不過，此次上海之旅卻是荊天棘地，困難重重；袁世凱對於革命黨人欲圖

⁷⁸ 蔣中正，〈上總理陳述歐戰趨勢並倒袁計畫書〉，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6，頁 4、5。

大舉，早已嚴陣以待。蔣中正於9月上旬抵達上海後不久，袁世凱就指示偵緝隊，於法租界暗殺范鴻仙作為反制。范鴻仙死於9月20日，此事對革命黨人的打擊，可由11月1日孫中山致同志鄧澤如的信函，一探究竟：

前月范鴻仙君在滬被刺。范君係安徽舊同志，辦事甚久。此次擔任上海事，已運動北軍過半，袁賊一方知其勢不可遏，乃懸紅暗殺之，花紅六萬元，其死與宋教仁相類。范死同時，上海鎮守使捕殺其北來軍士二百餘人，蓋皆與范通而擔任代表者。又埋攻製造局之炸藥，亦被發覺。

在這封信中，孫中山也提到浙江討袁失敗的始末：

上海本與杭州省城事為一氣，范死，浙江事亦有頓挫。至上月廿日杭州省城破壞機關五處，捕去黨人三十餘，軍事主任夏之麒（寅卿）亦與焉。夏老成負重望，其在江浙，屢為武備陸軍學堂總辦，與廣東之趙聲相似，而勢力尤大。其謀浙事已數月，一切俱已準備，只以遷延期日（因款不足），洩漏風聲，而我重要人乃俱不能出險，殊可傷也。⁷⁹

關於浙江起義與蔣中正的關係，日文史料則可提供一些補充。日本駐杭州代理領事瀨上恕治，於10月30日致日本外務省的報告，收錄了一份北京政府發給浙江將軍朱瑞的電報。內容如下：

根據密報，蔣介石、徐仁士、夏次崖等於近日來正從事煽動浙江第6師軍隊之工作，且企圖以該省的衢州為根據地，謀求將勢力擴張至江西省、安徽省等地，對此應提高警覺。⁸⁰

從這份電報內容可得知，北京政府對革命黨的行蹤瞭若指掌。在敵暗我明的情況下，蔣中正此次上海行，自然以失敗收場。10月29日，日本外務省政務局第一課綜合報告這次浙江起義：

⁷⁹ 原件無年月，編輯酌定此函為1914年12月1日，可是按其內容，應為11月1日。孫中山，〈致鄧澤如告范鴻仙被刺事函〉（1914年11月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以下略），《國父全集》，冊4，頁336-337。

⁸⁰ 「在杭州領事館事務代理瀨上恕治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年10月30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4，機密第36號。

目前在東京的革命黨領袖陳英士，日前命同志蔣介石回國從事革命運動。蔣回國以後，專以上海為據點，籌措在浙江省杭州方面的起義活動。近日原本計劃在杭州起事，幾乎已近成熟階段，不料上述計畫被北京政府察知，導致數日前當地有同志十多人被捕，讓此計畫完全泡湯。蔣已於昨夜打電報將經過情形報告陳英士。根據陳所述，杭州為富饒之地，一旦發生動亂，即可掠奪資金充作資金，因此選在杭州起義，軍略上已立於不敗之地。再則，要躲避官兵的追擊時，還可漸次退至台州及溫州等南方，拉長動亂以外，還可趁亂掠奪軍資。之前陳英士等在東京招募日本陸軍退伍軍人，就是為了安排他們擔任此次動亂革命軍的指揮。目前日本後備軍人為了加入革命，已有二十名到上海（除兩名為下士以外，其餘皆為校級軍官）。⁸¹

誠如孫中山所云，上海與杭州本為一體，在兩地的革命組織相繼被破壞，主事者也相繼罹難的情況下，蔣中正以浙江為根據地的革命再起計畫，只得放棄，而於 1914 年年底不得不再度亡命日本。⁸²

根據蔣中正自己的回憶，閉門苦讀，是他此次鍛羽而歸後的東京生活寫照。他提及：「是年余於軍事學研究，覺有心得，舉凡士官學校之課程，皆聘日人小室教授而學習之。」⁸³蔣中正並沒有入士官學校，已如前述。利用這段空閒研讀進修，彌補當年沒有繼續深造的遺憾，是蔣中正在面對事業瓶頸時的抉擇，可反映蔣中正兢業不休的生活面貌。

依據相關史料紀錄，回到東京後的蔣中正，並沒有立即面謁孫中山。他再次獲孫中山召見，是在 1915 年（民國 4 年）3 月 6 日。⁸⁴易言之，浙江起義失敗後，蔣中正雖然於 1914 年年底回到東京，卻一直無法獲得孫中山召見。這

⁸¹ 「支那革命ニ關スル」（1914 年 10 月 29 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14，乙秘第 2158 號。

⁸² 李勇、張仲田，《蔣介石年譜》，頁 27。

⁸³ 〈蔣中正日記：1929 年 8 月 31 日〉。

⁸⁴ 「孫文ノ動靜」（1915 年 3 月 7 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15，乙秘第 491 號。

和 1914 年 8 月他從東北回來，在 15 天之內，有 24 次獲孫中山召見的紀錄相較，親疏之比，十分懸殊。

1915 年 3 月 6 日，蔣中正由王統一相伴，謁見孫中山。在這稍早前，陳其美已先到孫中山住處等候，蔣中正來後，與孫中山談了 1 個鐘頭 25 分，才與陳其美一同離去。⁸⁵談訪內容雖不得而知，然顯而可見的是從這一天起，蔣中正又恢復可直接受命於孫中山的地位。

毛思誠編纂的《民國 15 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的 1915 年部份，有這麼一段記載：「是春陳其美……由日本回國，留公在東，處理未了之事。公送至橫濱輪次，臨別黯然曰：『此去萬一不幸，而為袁氏所害，余當為兄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言已，泣數行下。」⁸⁶這段記載透露兩個線索：一是陳其美於 1915 年春天重回上海；二是雙方告別時，猶如死別，彼此都懷著沉重的心情。將這段情景重新納入歷史脈絡探討，對當時的蔣中正以及他與孫中山的互動關係，似乎可提供另外一個角度的省思。

蔣中正浙江討袁失利回東京後，見不到孫中山，顯然是遭其冷落。至於雙方關係解凍，是在陳其美離日返滬前夕，故應和陳其美離日脫離不了關係。陳其美長年為胃疾所苦，⁸⁷這也是日前東北討袁或浙江討袁事件，他均未出馬，而由蔣中正代為出面的緣由。如今，鑑於蔣一事無成，陳因而親自出馬，可謂滿懷悲壯之情。尤其是他到上海後，孫中山 4 次電召他回日本，他「以事未成，無以對在東同志，不願東渡」為由，⁸⁸拒絕再回東京。陳其美懷抱破釜沉舟、視死如歸的決心，當然不是臨時起意，應是他決定回上海親征時就已下定的心

⁸⁵ 根據日本警方的監視紀錄，陳其美是在 11 點 15 分到孫中山住處，而蔣中正與王統一是在下午 3 點 10 分到。不久，王統一在下午 3 點 55 分先離去，而蔣中正與陳其美是 4 點 35 分同時離去。「孫文ノ動靜」（1915 年 3 月 7 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15，乙秘第 491 號。

⁸⁶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34。

⁸⁷ 陳其美於 1914 年 1 月 26 日赴大連，不料當天就因胃病復發，住進滿鐵醫院，直到 3 月 15 日離開大連，返回日本。但在回東京後，又因舊病復發，住院三個月。姚輝、朱馥生，《陳英士評傳》，頁 136-137。

⁸⁸ 蔣中正，〈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畫及事略〉，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6，頁 8。

意。蔣中正與他在橫濱之所以如生離死別，想必是被陳其美這股「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悲情所感染。因而當陳其美決定自投虎口，親赴上海主持黨務的前夕，孫中山之所以願意再見蔣中正，當然和陳其美的遊說有關。此外，尚有事務上的必要考量，尤其是東京本部與上海的聯繫，仍須蔣中正協助。孫與陳情誼深篤，所謂「愛屋及烏」，蔣中正也得以再蒙其用。

從3月份蔣中正再次獲孫中山接見以後，雙方見面次數如下：4月份2次，5月份3次，6月份1次，7月份2次，8月份3次，9月份3次，10月份2次，11月份5次。⁸⁹這麼頻繁的見面次數，可呈現出兩層意義：首先，自3月份起，每個月皆有會面紀錄，表示雙方關係不僅寒冰已融，並開始趨於穩定。其次，自8月份起，雙方更是會面頻繁，此與孫中山急欲召回陳其美，圖謀大舉有關。8月3日，美人古德諾(Frank J. Goodnow)在北京《亞細亞日報》發表〈共和與君主論〉一文，公然宣揚在中國推動君主立憲的理念。8月13日，推進帝制運動的「籌安會」宣告成立。⁹⁰當袁世凱急欲稱帝的野心日漸暴露，孫中山急欲召陳其美回東京共商大計，力謀反制之道，身為陳其美嫡系的蔣中正，也因此得以密集會見孫中山。

陳其美在9月4日一度回到東京，⁹¹10月上旬又再度趕回上海。⁹²蔣中正則在11月下旬回上海，在他臨走前夕，從11月3日起到10日止，8天內見了孫中山5次。⁹³如此密集會見，一則凸顯黨事的急迫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蔣中正在孫中山心目中的重要性。浙江失利事件的陰霾，自此一掃而空，蔣中正又恢復參與決策的地位。

按目前坊間得見的蔣中正傳記，皆將1915年11月10日淞滬鎮守使鄭汝

⁸⁹ 「孫文ノ動靜」，〈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6-17。

⁹⁰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全譯本第4冊》，頁184-185。

⁹¹ 「支那革命ニ關スル」（1915年9月5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7，乙秘第1786號。

⁹² 莫永明、范然，《陳英士紀年》（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369。

⁹³ 蔣中正是11月3日、5日、8日、10日拜訪孫中山，其中10日一天內求見2次。參照「孫文ノ動靜」，收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7。

成被刺，視為陳其美、蔣中正為求上海的革命再起，聯合出擊的第一項反袁行動。⁹⁴然按日本警方監視紀錄，當日蔣中正兩度拜訪孫中山，一次是上午 10 時，10 時 10 分離去，另一次是下午 3 時 55 分，4 時 10 分離去。⁹⁵由此觀之，鄭汝成被刺，與蔣中正無直接關連；反而是同年 12 月 5 日在上海爆發的肇和軍艦反袁事件，才出自於蔣中正的構思。

按蔣中正所擬定「陸海並取計畫」，即以策動肇和軍艦兵變為第一步驟，接著由該艦砲擊江南製造局；在砲擊同時，革命黨人也開始由陸地進攻江南製造局，務求海陸並進，以攻佔該製造局作為進佔上海的序幕。⁹⁶不料，因聯絡不週，肇和軍艦雖按原訂計畫砲擊江南製造局，應自陸路進攻的同志卻未應聲響應。至於其他各地攻佔市區警局、電話局、工程總局等目標者，也皆陷於各自苦戰，旋即為袁軍一一擊破。最後，肇和軍艦也因孤掌難鳴，又被其他軍艦夾擊，只得在同仁死傷枕藉之下棄艦而去。⁹⁷

肇和軍艦兵變雖告失敗，但反袁氣勢卻因此大振，二十天後，雲南宣布獨立，護國戰爭正式爆發。對於陳其美及蔣中正而言，如何利用護國軍軍興，再度鼓動上海地區的反袁氣勢，自是當務之急。四個月後的江陰要塞短暫獨立，就是由上海的革命黨人策動所致。

江陰距離上海西北約一百三十公里，居於長江東流入海、江面陡然寬闊的地理位置，為控制長江海軍出入的軍事要地。⁹⁸按蔣中正之規劃，準備「先取

⁹⁴ 持此說者，首見於毛思誠的著作，餘如 Pichon Pei Yung Loh、秦孝儀、嚴如平、鄭則民、周盛盈、宋平、張憲文、方慶秋、崔曉忠等人皆如是。參見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34；前引 Pichon P. Y.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p. 29；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頁 21；嚴如平、鄭則民，《蔣中正傳稿》，頁 38；周盛盈，《孫中山與蔣介石交往紀實》，頁 24；宋平，《蔣介石：總司令、委員長、總裁、主席、總統》，頁 26-27；張憲文、方慶秋主編，《蔣介石全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上冊，頁 42-43；崔曉忠，《青年蔣介石》，頁 127。

⁹⁵ 「孫文ノ動靜」，〈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17。

⁹⁶ 蔣中正，〈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畫及事略〉，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6，頁 11。

⁹⁷ 張憲文、方慶秋主編，《蔣介石全傳》，上冊，頁 43-44。

⁹⁸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全譯本第 4 冊》，頁 239。

江陰，扼長江之咽喉，使長江海軍不能活動，然後再圖上海。故江陰發動後，決計由吳淞響應，先固要塞，再襲江南製造局，以扼長江門戶。」⁹⁹襲取江陰要塞，由蔣中正及楊虎共同負責，在內部人員的策應下，江陰要塞於4月16日不戰而下。¹⁰⁰不過，當袁世凱命江蘇督軍馮國璋調集大軍鎮壓時，革命軍方面卻臨戰而懼，內部開始譁變，成員一一潛逃，最後只剩下蔣中正一人獨守，最終只得黯然離去。江陰獨立，前後五天。¹⁰¹

江陰要塞固然不戰而下，最後卻不戰而棄，因而說不上豐功偉業，只能說中華革命黨人在上海地區是奮鬥不懈，只要有一絲機會，皆全力以赴。也因中華革命黨人的奮戰精神，讓北京政府深感芒刺在背。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在上海法租界被刺，無非是北京政府的一項反制。¹⁰²

陳其美的死，對中華革命黨而言，當然是無可彌補的損失。尤其當各路人馬為反袁，在上海招兵買馬之際，陳所留下的權力真空，更為各路人馬所覬覦。依據蔣中正的回顧，其中尤以歐事研究會鈕永建的動作最大，陳其美生前的幕僚，似乎皆被鈕氏納入軍務院護國軍系統，中華革命黨在上海的組織，頓時形同瓦解。¹⁰³

當蔣中正在上海已無用武之地，孫中山乃任命蔣中正為東北軍參謀長。中華革命黨討袁不遺餘力，其東北軍於1916年5月4日起事於山東濰縣，為唯一使用青天白日軍旗的革命武力，除陸軍二師一旅外，尚有航空隊及華僑義勇團，一舉佔領魯中十餘縣，駁駁有進逼山東省會濟南之勢。總司令初為居正，袁死後，居正北上北京，孫中山即派許崇智代理總司令，而以蔣中正為參謀長，負責整訓。¹⁰⁴蔣於7月31日赴任，於8月12日離職。蔣中正日後回憶：「余

⁹⁹ 蔣中正，〈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畫及事略〉，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6，頁11。

¹⁰⁰ 張憲文、方慶秋主編，《蔣介石全傳》，上冊，頁45。

¹⁰¹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全譯本第4冊》，頁241。

¹⁰² 莫永明、范然，《陳英士紀年》，頁431。

¹⁰³ 〈蔣中正日記：1929年8月31日〉。

¹⁰⁴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223。

奉總理之命，於是赴山東濰縣為革命軍參謀長，佐理居正、許崇智進行軍事，為陳中孚事事掣肘，且其貪污不堪共事，故余即到北京辭卸而回滬寓。」¹⁰⁵從這段日記可以理解，蔣之所以只任職 13 日，被陳中孚排擠是主要原因。¹⁰⁶

蔣雖只任職 13 天，卻留下了詳盡的工作日記。日記內容五花八門，然其格式一成不變，尤其是每天必記今日所見，擬改正之處。例如，7 月 31 日：見各處衛兵口號不明，以後對答者，須唱當晚口號。8 月 1 日：擔槍者有槍身向上及向右者，以後當下令皆改為向右，以歸統一。8 月 2 日：軍隊衛生宜注意。8 月 3 日：各團、隊所有軍械軍裝，擬令其限日呈報。8 月 4 日：各團、隊起居教練時間，須歸一律。8 月 5 日：總司令部出入人員，擬發出入證為憑。8 月 6 日：總司令部衛兵，每日須由副官處值日員點名檢查。8 月 7 日：總司令部擬設軍醫科，且須委軍醫科長。各師、團、隊亦宜設軍醫，以資整頓衛生。8 月 8 日：各師、旅操法，當照民國 2 年之操點施行。8 月 9 日：兵士老少不一，當精選嚴擇，須照總司令部所發徵兵規則為準。8 月 10 日：軍隊名冊未報，則實員之數難知，餉項無度，其難一也。裝械之數不清，則種式難分，戰鬥力難知；一旦有事，計畫難定。8 月 11 日：兵士有過，不准罰跪，以保軍人體面。8 月 12 日：擬定總司令部編制表。¹⁰⁷

由此可見，蔣中正對部隊的觀察鉅細靡遺。他不僅注意到名冊未報、裝械數目不清等涉及總體軍事預算及總體戰鬥力的弊端，還注意到罰跪士兵等有損士兵士氣，及不引進軍醫制度則無法有效維護士兵健康等涉及士兵個體戰鬥力的問題。除了戰鬥力的提升及整體預算的掌握外，有關保密防諜等戰鬥力維繫的問題，也是他的考量重點。

¹⁰⁵ 〈蔣中正日記：1929 年 8 月 31 日〉。

¹⁰⁶ 在毛思誠的書中，對這段過程有更詳盡的補述：及抵濰，副官長陳中孚，已編成兩師一旅，師長及師長以下各軍官，均擅自委定。第一師師長，為其腹心朱霽青，部隊紀律甚壞。第二師師長呂子人，軍中祇知有陳副官長，而不知有居總司令。公雖事無鉅細竭力整頓，而權不集中，難著成效，軍隊之腐敗如故。居去北京，許崇智代其職，呈請解散。公乃赴北京觀察政局，秋回滬。參見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38。

¹⁰⁷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全譯本第 5 冊》（台北：中央日報社，1976），頁 1-22。

十三天的參謀長職務，證實他對治軍有理念，也有施行步驟。不過，沒有長官的支持，一切都是枉然。蔣乃以迎接總司令居正為由，轉赴北京，自此沒有再回任。至於這批東北軍，在黎元洪繼任為大總統後，奉令與山東督軍張懷芝洽商改編，調駐濟南，終至為張懷芝所分化、繳械及編併。¹⁰⁸

離開東北軍的蔣中正，經由北京而回到上海，爾後又返回奉化老家。1916年9月至1917年（民國6年）6月這段期間，蔣中正因無要務在身而賦閒在家。箇中緣由，當然和中華革命黨的處境有關。¹⁰⁹1916年6月6日袁世凱逝世，護國軍之役遂告結束。南北雙方則在恢復約法及國會的前提下，達成和解，中國再度統一。再度統一後的中國，需要政治勢力的再整合，然而整合過程中，中華革命黨並不是主角。護國軍是由立憲派與革命黨合組而成的反袁統一戰線，但革命黨人是以李烈鈞、陳炯明、李根源為主的歐事研究會掛帥，皆是當年反對孫中山的改造計畫，而不願加入中華革命黨者。¹¹⁰反袁之役既然不是由中華革命黨擔綱，反袁後的政治版圖重建，中華革命黨因此無緣置喙。

不過，再度統一後的中國，不久又陷入混亂。首先是總理段祺瑞的免職風波，其次是督軍團的獨立事件，最後是張勳復辟。¹¹¹當復辟事起，孫中山首斥段祺瑞召禍致亂，於1917年7月8日前往廣州，倡導護法，斥段為「以叛討叛，以賊討賊」，請國會議員南來行使職權。¹¹²對孫中山的倡導護法，海軍首先響應。海軍總長程璧光親率第一艦隊十艦於8月5日抵達廣東，以具體行動表達護法的決心。¹¹³關於海軍決心奮起，蔣中正在他的日記中，特別記錄了這一段秘辛：

¹⁰⁸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230。

¹⁰⁹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頁29-30。

¹¹⁰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下冊，頁516-518。

¹¹¹ 事件起因於總統黎元洪因總理段祺瑞執意參戰，並囑使所謂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逼迫國會通過參戰案。為此黎只得將段免職。但此一免段之舉，卻造成段派督軍的不滿，紛紛宣布獨立，以示抗議，黎為求撫平督軍團的不滿，只得求助於安徽督軍張勳。不料，張勳一到北京，就宣布復辟，逼使黎只得逃入日本使館避難。黎為求反制，只得復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請副總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務，並電令各省出師討伐張勳。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527-529。

¹¹²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531。

¹¹³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268。

民國六年中德絕交，中國加入協約國參戰，本黨竭力反對，當時德國公使下旗回國，以其在華留餘之資金約二百萬元貢獻於本黨總理，資助革命。總理、余極秘密經理此事，即以此款運動北洋艦隊，由總理交程璧光率領南下，赴粵組織軍政府，而留余在滬主持一切。當時唐紹儀暗使陳炯明向總理追問此運動海軍之款從何而來，總理祇答其可問介石自明，及余抵粵軍時，陳復向余追問，余乃設辭曰，賣卻交易所各股票所得也，陳乃信以為真。今日世人以余在交易所投資百萬元所得資金貢獻總理作軍費之說，其或亦由此以誤傳誤而來乎！其實當時總理與余及季陶、靜江四人所有之優先股，最高價時亦約值百餘萬元，其後皆為靜江一人投機輸完，總理與余並未有獲得毫利，更於革命無關。當靜江投機倒帳時，余反由粵借匯廿萬元補救靜江也。惟總理赴粵時，確由交易所董事公開貢給廿萬元之數，以為發起倡導者之報酬而已，此世人傳余為在交易所任成員或投機之說所由來也。¹¹⁴

這段紀錄透露出三項訊息：一是策動海軍出面護法的經費來自於德國公使資助；二是此一活動經費由蔣中正經手；三為蔣雖曾參與交易所投資，但並未獲取暴利，也沒有利用交易所的暴利所得捐贈給孫中山。藉由德國政府的檔案，部份印證了這段秘辛的內容。中德兩國於 1917 年 3 月 10 日斷交，德國公使辛策(Von Hintze)於 3 月 25 日下旗返國。臨行前特命令德國駐上海總領事克里平(Knippling)竭力聯絡孫中山，並同意以金錢支持中華革命黨的倒段運動。為此，克里平派其翻譯西爾穆爾(Schirmer)與曹亞伯相偕秘密謁見孫中山。對於共同倒段，孫中山甚為贊同，惟為影響海、陸軍，孫盼德支援二百萬元款項。德國政府理解若不倒段，就無法阻止中國參戰，因而同意孫的要求，冀望藉由孫的護法運動，達到打倒段政權的目的。¹¹⁵

關於德國支援孫中山護法一事，當時就有傳聞，¹¹⁶迄今所能掌握的中文資

¹¹⁴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4 月 24 日〉。

¹¹⁵ 李國祁，《中山先生與德國》（台北：台灣書店，2003），頁 216-217。

¹¹⁶ 根據德籍學者墨軻(Peter Merker)之研究，關於孫中山接受德國政府金援一事，華北日報於 1917

料中，¹¹⁷蔣中正的日記，特別是關於具體援助金額的記載，與德國政府中的檔案記載完全一致。由此可見，蔣中正日記對於此段史實的紀錄，真實而可靠。此外，蔣中正日記還透露了此筆經費是由他經手，以及他和孫中山曾投資交易所一事。關於前者，聞所未聞；至於後者，早已成爲街談巷議。¹¹⁸在他日記記錄的三件事裡，關於德國金援及投資交易所已獲證實，德國金援由他經手一事，應非向壁虛構，俟更多史料問世，或可再證其真。

四、廣州革命時期：邊緣及核心的徘徊

1920年（民國9年）10月29日，孫中山致蔣中正信，提及：「執信忽然殞逝，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黨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則又過之。」¹¹⁹孫中山對蔣中正的評價，以「勇敢、誠篤、知兵」爲主軸。所謂誠篤，意指對金錢的不苟。護法運動之際，德國金援之所以要由蔣中正經手，一則表示孫中山信任蔣中正的操守；一則也表示在陳其美過世後，上海的地緣關係已由蔣中正繼承。對蔣中正而言，經手德國金援，是與上海金融界建立管道的良好契機。這些人際關係的累積，無疑地成爲蔣中正建構權力網絡的基石。

廣州軍政府在1917年9月成立，孫中山出任大元帥，蔣中正時在上海，並未隨行。¹²⁰軍政府甫成立，蔣中正即向孫中山提出一份「對北軍作戰計畫書」，他認爲：「北方政府所轄之軍隊，約在三十萬以上，然實際上可爲其動

年7月11日，就有此報導。墨軻，〈德國人眼中的孫中山〉，收入曾一士主編，《第四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父紀念館，2001），頁78。

¹¹⁷ 按李國祁之研究，孫中山只收到一百萬元，與德國檔案中的紀錄相較，有一百萬元的差距。參見李國祁，《中山先生與德國》，頁219-220。

¹¹⁸ 例如中文代表性的論文有楊天石，〈蔣中正先生和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近代中國》，期139（2000年10月），頁158-179。日文代表性的論文有橫山宏章，〈蔣介石と上海交易所：仲賣人時代について〉，《中国研究月報》，期527（1992年1月），頁15-28。

¹¹⁹ 〈致蔣中正信託陳炯明回粵事函〉（1920年10月29日），收入《國父全集》，頁270。

¹²⁰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全譯本第5冊》，頁100。

員者，即以馮、段二派勢力合計，則其數亦不過六萬。」¹²¹相較於北方各督軍間的離心離德，軍政府則可從粵、桂、雲、貴、川、湘等大西南地區動員到多於敵軍三分之一的兵力。因此，他將作戰計畫分兩期，左、中、右三路揮軍北進，會師北京。¹²²

誠如蔣中正計畫指陳，「北軍雖眾，而為段氏冒死南犯者甚尠」。¹²³蔣對北方政府的掌握，可謂洞察秋毫。可是，各督軍之間「同床異夢」，並非北方政府獨有的奇特現象，廣州軍政府也有同樣的困擾。按軍政府的編制，除孫中山為大元帥外，尚有唐繼堯及陸榮廷為副元帥，惟兩人並非真為護法而反段，對副元帥一職始終拒不任職；¹²⁴至於伍廷芳、唐紹儀、孫洪伊、程璧光等人，名為內閣各部會首長，皆未到任。¹²⁵無兵無餉，正是軍政府的最佳寫照。¹²⁶

蔣中正的作戰計畫，反映出他對南方政壇的隔閡，也凸顯出他與核心集團的運作，尚有距離。這篇不能和現實結合的作戰計畫，終於石沉大海。不過，用心觀察時局，勇於表現自己見解的蔣中正，並不氣餒。當北京政府正式準備對湖南用兵，蔣中正於 10 月 1 日又向孫中山上陳「滇粵兩軍對於閩浙單獨作戰之計畫書」，主張護法軍應在湖南採守勢，而把主力作戰轉集中於閩、浙沿海一帶，爾後再伺機北伐。¹²⁷只是，這篇作戰計畫同樣罔顧現實層面，因而面臨和上一篇同樣的命運。即使如此，這仍不影響孫中山對蔣中正的重視。孫中山首先於 11 月 1 日，任命蔣為大元帥府參軍，於翌年 3 月，又任命他為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囑他負責規劃閩南戰役。¹²⁸

¹²¹ 蔣中正，〈對北軍作戰計畫書〉，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6，頁 12。

¹²² 蔣中正，〈對北軍作戰計畫書〉，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6，頁 13-14。

¹²³ 蔣中正，〈對北軍作戰計畫書〉，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6，頁 12。

¹²⁴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 531。

¹²⁵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 277。

¹²⁶ 按時任大元帥府機要秘書邵元沖之回憶：「軍政府本身既無收入，所恃者僅海外華僑募助之款，極為竭蹶。軍政府內各職員，自部長、秘書、參軍各長，以至書記、事務員，每人一律月領零用 20 元。」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 276。

¹²⁷ 蔣中正，〈滇粵兩軍對於閩浙單獨作戰之計畫書〉，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6，頁 15-17。

¹²⁸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全譯本第 5 冊》，頁 109。

雖然軍政府無兵無餉，不過，在孫中山七個多月的任期內，¹²⁹也有一些小突破。由廣東省長朱慶瀾處取得警衛軍 20 營，改編為軍政府直轄護法軍，由陳炯明率領，以援閩粵軍的名義與任務，得以進軍於閩南，為中華革命黨保留了唯一的革命武力，可謂孫中山投入護法運動的另一意外收穫。¹³⁰

蔣中正得以在孫中山唯一嫡系部隊中負責統籌作戰參謀業務，顯示孫對蔣的期許一如往昔。援閩粵軍在 1918 年（民國 7 年）6 月，向福建進軍，為了進閩，蔣中正前後也撰寫了「粵軍第一期及第二期作戰計畫」，展現出他卓越的參謀規劃能力；援閩軍也因得力於他的作戰計畫，使得戰事頗有斬獲。¹³¹

可是，蔣中正卻難安其位，3 月 15 日到職，只任職了 138 天，7 月 31 日就堅持離職，理由是不得同仁信賴。¹³²援閩軍總司令陳炯明為了慰留他，曾親書「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一人」。¹³³由此可見，蔣中正在參謀作業上的能力，已獲肯定。

在陳炯明再三邀請下，蔣中正於同年 9 月 18 日再度赴職，新的職務為粵軍第 2 支隊司令官。這是蔣中正第一次擔任部隊司令官，統率 1,000 名的部隊，初期戰績不錯，從嵩口、丘濱一路破敵到永泰。不料，當福州指日可克，卻被逼停戰。爾後因對手福建督軍李厚基擅自破壞停戰和約，以 5,000 兵力反撲第 2 支隊，部屬懼戰不聽指揮，而永泰已被敵軍攻陷，蔣中正只得隻身突圍。事後，陳炯明雖說這是「非戰之罪」，¹³⁴蔣中正仍難以釋懷，於 1919 年（民國 8 年）3 月 5 日請長假赴上海。在孫中山的勸說下，蔣中正於 5 月 2 日復職，但於 7 月 27 日又辭職，理由是受人排擠。¹³⁵這項藉口，日後就成為蔣不斷重

¹²⁹ 孫中山自 1917 年 9 月 10 日就任大元帥，翌年 5 月 4 日辭職，主持軍政府僅 7 個月又 26 天。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 285。

¹³⁰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 285。

¹³¹ 周盛盈，《孫中山和蔣介石交往紀實》，頁 32。

¹³² 〈蔣中正日記：1918 年 7 月 25 日〉謂：「汝為（許崇智）覆電，再三支吾，不遵合攻大浦與峰市命令，憤激殆甚。汝為吾私友義友，而總司令與我固無一點私情者也乎，見此不能不為吾友羞也。故辭退之心甚堅，明白事理者尚屬如此，無復何言，前途悲觀可知想矣。」

¹³³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66。

¹³⁴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75。

¹³⁵ 〈蔣中正日記：1919 年 7 月 30 日〉，對此記載如下：「（參謀長）鄧仲元（鄧鏗）來會，晚

覆使用的措辭。

從 1918 年 2 月辭去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至 1924 年（民國 13 年）4 月接任黃埔軍校校長為止，蔣中正總共辭職 12 次，休長假 1 次。易言之，於短短 6 年間，蔣氏不斷奔走於到職、離職之間。13 次的任職中，任期最長者為 1918 年 9 月 18 日，初任粵軍第 2 支隊司令官，長達 168 天。最短者為 1921 年（民國 10 年）2 月 14 日及同年 9 月 17 日，皆是當天離職。

若將 13 次離開工作崗位的過程再加整理，則可再細分為：1918-1919 年休長假 1 次，辭職 2 次，奉職日總數 12 個月又 27 天。¹³⁶1920 年辭職 2 次，奉職日總數 23 日。¹³⁷1921 年辭職 3 次，奉職日總數 4 日。¹³⁸1922-1923 年（民國 11-12 年）辭職 4 次，奉職日總數 181 日。¹³⁹1924 年辭職 1 次，奉職日總數 28 天。¹⁴⁰

以蔣中正的辭職次數及奉職日數為經，時勢發展為緯，相互交錯觀察回顧這段史實，應更能貼切掌握蔣中正的思想及言行。在這六年期間，辭職次數和年代沒有直接關連，但奉職日數因年代而有較大的差異。尤其是前兩年，奉職日數幾乎是後面四年的倍數。主要原因是 1918-1919 年，護法運動新起，中華革命黨總算藉援閩之命，培養出第一支直屬孫中山的武力部隊。這次部隊由陳炯明負責，是革命黨人的共同希望，當時眾人皆力求突破困境，革命黨陣營內部反而較能相忍為國。

往訪仲元，彼又來，浮薄狹僞者，實不屑交談也。此次辭職，純出于人格與良心問題。彼以其勢，我以其道，彼以其利，我以其義，自以為道義戰勝勢利也，故心廣志明，無所牽窒也。」

¹³⁶ 1918 年 3 月 15 日以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赴任，7 月 31 日辭職。同年 9 月 18 日，以粵軍第 2 支隊司令官赴任，翌年 3 月 5 日請長假。1919 年 5 月 2 日復職，於同年 7 月 27 日辭職。

¹³⁷ 1920 年 4 月 11 日赴漳州粵軍總司令部任職，4 月 15 日離職。同年 10 月 16 日赴粵軍第二軍許崇智部任總參謀長，11 月 4 日離職。

¹³⁸ 1921 年 2 月 14 日赴廣州參與平桂作戰會議，當日辭職。同年 5 月 20 日，再赴廣州參與籌劃平桂方略，同月 24 日辭職。同年 9 月 17 日赴廣西西寧，參與籌劃粵軍北伐，當日辭職。

¹³⁹ 1922 年 1 月 18 日赴桂林任大本營參軍兼第二軍總參謀長，4 月 23 日離職。同年 10 月 22 日，赴福州任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1 月 24 日辭職。同年 12 月 18 日再赴福州赴職，翌年 1 月 15 日辭職。1923 年 6 月 17 日，出任陸海軍大元帥行營參謀長，同年 7 月 12 日辭職。

¹⁴⁰ 1924 年 1 月 24 日，任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同年 2 月 21 日辭職。

如前所述，1917年9月1日軍政府成立，孫中山任職大元帥不及八個月就離粵北去。桂系軍閥目無軍政府，廣東督軍莫榮新每每與孫中山為難，非常國會的政會議員聯絡桂系，謀擁岑春煊，排除孫中山，與北方議和，是孫中山無法安於位的主因。尤其是1918年5月，國會議決廢除大元帥，改推岑春煊為主席總裁，逼得孫中山只有出走一途。¹⁴¹

孫中山從廣州出走，當然代表革命黨事業的一大挫敗。離開廣州後，孫中山於1918年6月至1920年12月定居於上海，專心著述，完成《孫文學說》和《實業計畫》，¹⁴²並著手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¹⁴³

由於已喪失地盤，援閩粵軍便成了孫中山惟一的指望，而他對任職於援閩粵軍的蔣中正也更加倚重。援閩粵軍在1918年6月，開始進軍福建，待穩住陣腳以後，從原本人數不滿五千的部隊，在駐福建兩年期間，發展成包括兩個軍六個旅的勁旅。粵軍的本位主義猶如「死灰復燃」，使得非粵籍的蔣中正難安其位，於1920年總共到職2次，奉職總日數只有23天。1920年直皖大戰，援閩粵軍準備回師廣東，蔣中正身為孫中山的信徒，對粵軍有機會重回復興基地，當然是心往神馳；只是在本位主義盛行的粵軍裡，他出身浙籍，常受掣肘，無法施展抱負。例如這年的6月21日，他致函鄧鏗，提及在粵軍的困境：「既不能另自選將練兵，又不能如意整頓革新，平時或受撫循，臨陣則不聽指揮，欲圖更張，則枝節橫生。」¹⁴⁴他只能在關鍵時刻，才有稍許揮灑空間。例如，他於同年10月16日到職，20日就代替因病離軍的許崇智軍長，出任前線總指揮，並於22日攻克惠州。不過，當11月2日粵軍光復廣州後三天，¹⁴⁵蔣卻又再度離職。

1921年，蔣中正到職3次，奉職總日數只有6天。此因回到廣東的陳炯明

¹⁴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537。

¹⁴²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286。

¹⁴³ 改組日期為1919年10月10日。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286。

¹⁴⁴ 蔣中正，〈與鄧（鏗）仲元書談粵軍整頓之難〉，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6，頁35。

¹⁴⁵ 周盛盈，《孫中山和蔣介石交往紀實》，頁47。

日漸壯大，與孫中山的矛盾也日益明顯，對眼中只有孫中山而無陳炯明的蔣中正，當然是黨同伐異，不會假以顏色，使得蔣中正兩度在到職當日就憤而離職。

與前兩年相比，1922 年是蔣中正奉公較長的時期，第一次到職，就奉職了 95 天，因為他任職於孫中山親自統率的北伐軍，和陳炯明已脫離上下隸屬關係。不過，此刻孫、陳的衝突已趨白熱化。是年直奉之戰，如矢在弦，張作霖、段祺瑞約孫共同行動，可是陳炯明志在割據，不以北伐為然。¹⁴⁶他除了與湖南省長趙恆惕等倡行聯省自治外，且密與直系聯絡；為了阻撓北伐，還暗殺了粵軍參謀長鄧鏗。¹⁴⁷對於陳炯明公然抗命的行為，如何處置，成為廣州軍政府的「燙手山芋」。蔣中正主張，應不惜先用武力制裁陳炯明，然後再圖北伐；¹⁴⁸孫中山卻認為，北伐優先，對陳炯明應先盡安撫之能事。蔣中正為說服孫中山，不惜以去留相爭，但沒被接納。¹⁴⁹

爾後，他於同年及翌年又就職 3 次，每次就職皆只有 1 個月左右。前兩次他任職於東路討賊總司令部，後一次任職於大元帥行營。易言之，前兩次任職的上司是許崇智，後一次任職的上司則為孫中山。雖然負責的對象不一，但辭職的主要理由，還是在於受同儕排擠。例如，針對前兩次辭職的來龍去脈，蔣中正的解釋是：「當時軍中將領，界限甚深，每相排擠，凡對總理親信者，必欲去了而後快」；¹⁵⁰至於後一次，毛思誠為他所作的解釋則是「參佐軍務，不為人諒，反遭齟齬，憤而辭職」。¹⁵¹

1924 年，蔣中正已被任命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然學校經費不濟，他認為受負責供應經費的禁煙督辦楊西巖故意刁難，¹⁵²因而辭職，但兩個月後便即復職。令他忿忿不平的還是整個體制，誠如他於同年 3 月 2 日致孫中山函

¹⁴⁶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 564。

¹⁴⁷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 338-339。

¹⁴⁸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150。

¹⁴⁹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 340。

¹⁵⁰ 蔣中正，〈革命歷史的啓示與革命責任的貫徹〉，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9，頁 353。

¹⁵¹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200。

¹⁵²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233。

所言：「先生不嘗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諸中正乎？今敢還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於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實不敢臆斷。如吾黨果能確定方略，則精神團結，內部堅強，用人處事，皆有主宰，吾敢斷言今後之局勢，必能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敗，使以是而復致失敗，則中正敢負其責，雖肝腦塗地不恤也。」¹⁵³在這封發出不平之鳴的信函中，蔣中正同時批評孫中山不應將廣東軍政大權全交由許崇智一人把持，更認為將對黨國忠貞不二的胡漢民流放於上海，是不當之舉，所以強烈建言孫應將胡調回廣東，讓軍政分家，許掌軍事，胡掌民政。¹⁵⁴

這一封陳情信要求高度信任，有完全自主發揮的空間。從信的內容也可看出，對蔣中正而言，所謂自主空間，不是單一方向就可達到，他需要的不僅是孫中山對他個人的信任，也需要有一個能認同他的執政團隊來支撐他。蔣中正所以要求胡漢民回歸中央，正凸顯他對現行體制的強烈不滿，「獨木難撐大廈」，應是他追隨孫中山革命的長年之痛。

1924年3月15日，孫中山致電胡漢民，請其來廣州就任大本營秘書長。¹⁵⁵3月17日，孫以大元帥令免禁煙督辦楊西巖職，特派鄧澤如繼任，¹⁵⁶這一連串措施，應可謂孫中山對蔣中正陳情函的具體回應。在主要訴求已得到具體回應後，蔣中正於4月21日回到廣州。正式復職前，他還不忘於3月30日致電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職務代理人，也是時任廣東省省長的廖仲愷：「兄曰軍校月款已妥，是否政府另有指定，如徒藉該款，則仍不可靠，請詳復。」對於他的詢問，廖仲愷於4月3日復電如下：「軍校款，弟不問支出，兄亦不問來源，經費不乏，盡可安心辦去，惟請即來。先生近多感觸，親信者不宜離去也。」¹⁵⁷

¹⁵³ 蔣中正，〈上總理書縷陳一己委曲與對黨主張〉，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6，頁99。

¹⁵⁴ 蔣中正，〈上總理書縷陳一己委曲與對黨主張〉，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6，頁98-99。

¹⁵⁵ 《國父全集》，冊5，頁507。

¹⁵⁶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下冊，頁1468。

¹⁵⁷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251、252。

從廖仲愷的覆電，可知蔣中正的此次復職，得到三個不同層次的保障。首先，他將牽制他的政敵楊西巖徹底打垮，確保眼前已無人再掣肘。其次，他得到省政府主席廖仲愷保證經費支援無虞。最後，他將能認同自己的盟友胡漢民，重新安排回到領導核心體制，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可說發揮到淋漓盡致。

4月26日，蔣中正回到黃埔軍官學校視事，5月3日被特任為軍官學校校長，終於得到可發揮自己軍事長才的舞台。在6年之內，蔣中正12次辭職、1次長休的抗爭，自此告一段落。顯然，經歷過12次抗爭，對蔣中正最後能爭取到黃埔軍校的治校舞台，有密不可分的因果關係。為了更貼切地掌握蔣中正的崛起過程，以下將進一步探討他的辭職歷程。

蔣中正12次的去留抗爭，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階段是援閩粵軍時期，當時他是中堅幹部，但粵軍持本位主義，同儕與屬下皆視他為外來者，¹⁵⁸共同排擠，使他無法安於現職。當時對表示慰留者，是他的直屬長官陳炯明。到第二階段時，他已晉升到核心幕僚，抗爭對象已換成陳炯明，這時他所爭的是粵軍的定位；他無法忍受粵軍武力的私人化，眼中只有陳炯明而無孫中山。這時直接表達慰留者，已擴大到孫中山、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以及他的老友張靜江、戴季陶等人。等發展到第三階段時，他已經是幕僚長，這時抗爭對象已換成革命團隊，他需要的是一個能讓自己可充分發揮實力的舞台，至於對他表達慰留者，除了孫中山、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等黨國大老外，還涵蓋國民黨陣營中所有的核心成員，包括許崇智、楊庶堪、鄒魯、李濟琛等人。¹⁵⁹易言之，到黃埔軍校創校時期，蔣中正在國民黨陣營裡，已深受眾人矚目，頗具「仰望成峰」之勢。因為他已被視為能為國民黨培養黨軍的不二人選，從而幫

¹⁵⁸ 蔣任職粵軍期間，在日記中曾數度抱怨，例如1918年6月15日謂：「余至今為人監視者二次，一為江陰之戰，一為今日之李炳榮也」；1919年5月7日謂：「往第39營點名，為士兵侮辱，當時只有忍辱包羞而已。」李炳榮時任粵軍第一支隊司令，而蔣為司令部作戰科主任，兩人在職務上並無隸屬關係，但蔣仍受其牽制，粵軍內部對蔣排擠之狀，由此可見一斑。（蔣中正日記：1918年6月15日；1919年5月7日）。

¹⁵⁹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頁66-252。

助黨突破發展瓶頸，遂促使孫中山願意為他打破成規，提供一個可讓他盡情發揮的空間。

蔣中正 12 次的去留抗爭，不僅沒有造成他與黨疏離，反而使他更趨近黨的權力核心，為他在黨內累積更高的聲望。箇中緣由，可分幾個不同的層面探討。首先探討社會對他的評價，根據《申報》年度索引，該報首次報導廣州革命政府時期蔣中正的事跡，始於 1922 年，達 5 次之多。爾後上報次數更是逐年增加，例如，1923 年為 7 次，1924 年為 20 次，1925 年（民國 14 年）為 91 次，1926 年（民國 15 年）為 496 次，1927 年（民國 16 年）為 402 次。¹⁶⁰這一系列數字，非但為蔣中正在黨內的崛起，以及在全國政壇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提供見證，也提供了另一種觀測的角度。

1922 年蔣中正第一次上報，是 5 月 30 日，報導內容係引自粵軍要求陳炯明復職的電文。陳炯明原本身兼數職，惟於同年 4 月 20 日，經孫中山同意，辭去廣東省長、內政部長、粵軍總司令後，只保留陸軍部長一職。陳本無意辭職，原想以退為進，不意孫竟然核准。為此，陳於翌日就唆使駐南寧的粵軍舊部葉舉等人，聯名通電，聲言不再北伐，即行班師回粵。¹⁶¹俟粵軍葉舉、熊略等部於 5 月 18 日由桂入粵後，即刻聯名電請孫中山收回成命，要求清君側，撤革胡漢民、魏邦平、胡毅生、夏重民、謝持、蔣中正諸人。¹⁶²

由此可知，蔣中正之所以名列報端，緣於粵軍視他為反陳要角；然而蔣當時正於溪口賦閒，未任職位，只因此前擔任大本營參軍兼第二軍總參謀長，曾有先鞏固廣東，再圖北伐之議，不被孫中山採納，乃於 4 月 23 日離職。¹⁶³而蔣雖離職，猶被陳視為眼中釘，正可顯示蔣在陳心目中的份量。反觀與蔣同時列名者，莫不具顯赫經歷，胡漢民為大本營文官長、魏邦平為廣州衛戍司令、

¹⁶⁰ 根據申報索引編輯委員會編，《申報索引(1919-194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各冊「人名索引」部份資料。承蒙審查人指點，提出以蔣在《申報》的上報次數作為觀察其影響力的指標，並提供相關統計資料，謹此致謝。

¹⁶¹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頁 34。

¹⁶² 《申報》，1922 年 5 月 30 日。

¹⁶³ 萬仁元、方慶秋，《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頁 84-90。

謝持為總統府秘書長；相較之下，蔣中正只是大本營的一個軍事幕僚，尚未獨攬大權。但因葉舉等人將蔣列為除奸之列，使得蔣中正逐漸被媒體重視，自此登上「本埠新聞」版¹⁶⁴或「國內要聞」版。¹⁶⁵至於1923年，蔣中正被《申報》報導的次數增為7次，除了行蹤報導以外，¹⁶⁶增添職位更新的介紹。¹⁶⁷將蔣出任新職也列為報導內容，顯示蔣擔任的職位日趨重要。

1924年，《申報》對蔣中正的報導增為20次，除了行蹤、職位異動外，還增添了一項電報論戰，¹⁶⁸可見蔣中正對時勢政務的主張，已能左右廣州政局的走向。從《申報》對蔣報導次數的逐年提升，以及報導內容由事務發展到政策層次，這一連串變化，皆反映蔣已受眾人矚目的客觀事實。

至於他在黨內不平則鳴、勇於抗爭的人格特質，何以能得到黨內同志的諒解支持？就其三個不同時期的抗爭行為而論，蔣第一時期的抗爭對象是粵軍，其本位主義早為人所詬病，故蔣的抗爭並不被認為是無理取鬧。蔣第二時期的抗爭對象是陳炯明，陳炯明眼中無孫中山，眾人早就敢怒不敢言；而陳炯明事後公然反叛，甚而將蔣列為除奸目標，除證明蔣有先見之明外，更凸顯他忠於革命理念，不畏權勢的奮鬥熱忱。第三時期蔣的抗爭對象已換成整個革命體制，革命組織功能不彰，眾人皆感同身受，對蔣中正要求一個完全自主發揮的空間，並不覺得唐突，反而覺得應鼎力相助。是以，12次的抗爭經歷，為他累積了更高的聲望。

另一方面，他個人對黨的不棄不離，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例如1921年3月5日，正當孫中山在廣州準備召開非常國會選舉總統前夕，蔣中正特地致

¹⁶⁴ 例如1922年8月19日，孫中山在上海法租界寓所宴客，蔣中正就因受邀赴宴而被報導。《申報》，1922年8月19日。

¹⁶⁵ 同年10月30日，「福州通訊欄」中有蔣中正隨汪精衛、林森等人到福州的報導。《申報》，1922年10月30日。

¹⁶⁶ 1923年7月26日，「本埠新聞」版，報導蔣中正今日來滬。《申報》，1923年7月26日。

¹⁶⁷ 例如3月19日報導蔣出任大本營參謀長，6月22日蔣出任大元帥行營參謀長。《申報》，1923年3月19日；1923年6月22日。

¹⁶⁸ 5月24日《申報》的「國內專電」版，「李濟琛部全體將領，電許軍參謀長蔣介石，請勿派兵來肇。蔣覆電謂：南路軍事決進行，為便利起見，不得不派兵赴肇，並無他意於其間。」《申報》，1924年5月24日。

函給孫，主張在廣西未平，內部尚未達成共識之前，孫不應貿然選總統，¹⁶⁹展露出他為黨國直言無畏的個性。他這種處處以黨國為念的事例，在往後的歲月中，俯拾即是。他雖於 1920 年 4 月 11-15 日在粵軍總司令部任職 4 日就離職，但仍不忘於 6 月向孫中山上呈「湘粵軍共同作戰計畫」；¹⁷⁰1921 年 1 月、2 月及 3 月，他連續寫了三份意見書給孫中山，表達對時局的看法；同年 12 月，又上呈了一部「北伐作戰計畫」；1922 年 12 月，他寫了一部「閩中軍事報告書」；1923 年 3 月，他寫的是「平定潮梅計畫」。¹⁷¹是以，在他不安於位的六年中，每值關鍵時局，他總是勇於表達自己對時局的觀察，積極為黨的軍事作戰獻策。

蔣中正不在其位，但仍心繫革命大業，更凸顯他雖有志於革命，然而客觀環境不如人願，讓他有不得良木而棲之憾。尤其是 1921 年以後，他勤讀曾國藩著作，終能痛下立德、立智、立體之決心，一改早年驕奢淫逸的生活習性，勵志成為國民典範。他的改變顯而易見，¹⁷²一旦請辭，只會使人惋惜，而不會令人厭惡。

此外，蔣中正對於孫中山堪稱忠誠不二，而他與孫中山也一直保持密切互動；即使奉公時日不長，但一直沒有脫離權力核心。例如 1919 年 10 月 25 日，他奉孫中山之命，代表孫本人赴日本探訪朝野友人，前後二十日，足跡遍達神戶、京都、橫濱及東京，於 11 月 16 日返國。¹⁷³1922 年 6 月 16 日，兩廣巡閱使陳炯明圍攻總統府，公然叛變，孫中山得以倖免，於當日抵達海珠海軍司令部，率海軍反擊，並於 18 日電召蔣中正出面援助。蔣時在溪口故居，接電後，就

¹⁶⁹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121-123。

¹⁷⁰ 萬仁元、方慶秋，《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41。

¹⁷¹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112-114、119、121-123、137、172、190-191。

¹⁷² 針對蔣中正早年好色、易怒暴躁之個性，楊天石曾有精闢翔實之探討。而 Pichon Pei Yung Loh 則視之為蔣的認同危機，認為這是陳其美遇刺，蔣頓失良師益友，一時無法調適之故。但蔣在大量閱讀古典書籍，特別是《曾文正公全集》，效仿古人立志後，於 1921-1923 年間，在人格修養上大有進步。自此蔣日趨成熟，也克服了易怒的弊病。參閱楊天石，〈「天理」與「人慾」之間的交戰：宋明道學與蔣介石的早年修養〉，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頁 39-48；Pichon P. Y.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pp. 51-65。

¹⁷³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83-84。

立即於 29 日趕抵粵海，自此與孫中山並肩作戰；尤其是 7 月 9 日長洲要塞失守後，海軍無險可恃，蔣只得率艦馳往白鵝潭外國軍艦停泊處，以避陳炯明叛軍砲擊。孫、蔣兩人困守永豐艦 41 天，在確定前線赴援部隊戰機一時不易挽回後，蔣才於 8 月 9 日，勸孫中山改乘英艦赴港，以求轉進。¹⁷⁴

孫、蔣兩人交流，還有一事值得一提。1923 年（民國 12 年）8 月 16 日，蔣奉孫中山之命，出任孫中山赴蘇代表團團長，啓程赴蘇考察。代表團於 8 月 25 日進入蘇聯境內，於 12 月 8 日離境返國，前後 3 個月又 14 天，除途經西伯利亞地區外，還包括莫斯科及彼得格勒。拜訪的對象包括蘇聯共產黨政治局、東方局、蘇聯外交部、軍務部及教育部等等黨政機構。¹⁷⁵蔣中正認為中國革命可以納入蘇聯所領導的世界革命之一環，在反帝國主義的立場上，兩國利益一致；¹⁷⁶也由於蔣中正支持孫中山的聯俄政策，此次考察落實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的具體計畫，特別是黃埔建軍計畫，成果豐碩。

孫、蔣這三次的個人交流，性質各有不同。蔣第一次的日本訪問，主要目的是代表孫中山去探訪友人犬塚勝太郎的病況；¹⁷⁷這是一趟代表孫個人的情誼之旅，並沒有具體的政治意涵。孫特別選擇蔣，只是爲了安撫他。因當時蔣奉職於陳炯明領導下的援閩粵軍，出任中級幕僚，爲了抗議被同儕排擠，他兩次離職一次休假。而在奉孫中山之命赴日前，他正準備赴德國深造，以求一圓多年留學之夢；孫爲了留蔣，特別派他赴日訪問，表示器重之意。

至於第二次的交流，是孫正面臨個人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他召蔣赴難，是看重蔣「勇敢、誠篤、知兵事」的個性，當時蔣正因兩個月前抗議孫不肯先對陳炯明動手，憤而辭第二軍參謀總長職位而賦閒在家；但當他接到孫「事緊急，盼速來」的電報後，立即致書友人張靜江，交待後事，¹⁷⁸並立即離溪口經

¹⁷⁴ 萬仁元、方慶秋，《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89-82。

¹⁷⁵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201-216。

¹⁷⁶ 余敏玲，〈蔣介石與聯俄政策之再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4（2000 年 12 月），頁 82。

¹⁷⁷ 〈蔣中正日記：1919 年 10 月 30 日〉。

¹⁷⁸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 154。

上海直奔廣東。蔣「千里赴難」，展現出對領袖的忠誠，以及為革命大業不顧個人安危的犧牲決心，對正處困厄的孫中山而言，自然是欣慰無比。在關鍵時刻，蔣中正做出關鍵行動，為他常年不安於位的辭職模式，提供最有力的辯解。易言之，蔣毅然「千里赴難」，證明他不是貪生怕死之輩，為領袖為革命大業，他具有隨時獻身的熱誠。此前他常棄組織而去，只因組織成員因循怠惰，無法提供他一個可發揮長才的空間。

當中國革命歷經失敗，期盼藉由蘇聯協助為中國革命另覓出路，而蘇聯支持中國革命的重點計畫就是黃埔建軍，希望讓國民黨建立一支能效忠組織有革命信念的武裝部隊，孫中山選擇軍旅出身的蔣中正為代表團團長，不僅表示他是今後負責建軍計畫的主要負責人，也代表他是黨新希望的所在，蔣的去留，就成為世人觀察黨今後走向的指標。孫、蔣的第三次交流，孫的對應和往昔迥然不同。往年，他是以勸勉為主軸，重點是希望蔣共體時艱，在接受現狀下，勉為其難。但是當 1924 年 1 月再度面對蔣中正辭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一職時，他卻以不惜改變現狀，只求能滿足蔣之要求為首要考量。正因孫對蔣的認同，才使得蔣得以突破現狀，藉由黃埔建軍為自己覓得一個可發揮實力的舞台，也替廿世紀中國史的蔣中正時代揭開序幕。¹⁷⁹

五、結 論

蔣中正接觸革命黨人，始於 1906 年第一次自費赴東瀛留學期間。他首先在東京結識陳其美，接著藉由陳的引見，得以拜會孫中山。兩年後，即 1908 年被清廷甄選為留日陸軍學生，得以再度赴東瀛留學，並加入了同盟會。

早年的蔣中正，隸屬於陳其美門下。辛亥革命時期，他曾參與杭州起義，出任過滬軍第 5 團團長，在倒滿的大業上，立有汗馬之功；當陳其美與陶成章各代表同盟會與光復會爭奪上海的革命主導權時，蔣中正不惜以身試法，暗殺

¹⁷⁹ Pichon P. Y.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pp. 100-101.

了陶成章，對鞏固同盟會及陳其美在上海地區的權力基礎，有最直接的貢獻。二次革命時，他領兵攻打江南製造局；二次革命後，當陳其美亡命日本，蔣中正則成爲他的代理人，負責統籌上海地區的革命事務。

1914年6月12日，蔣中正在東京第一次與孫中山單獨議事。孫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蔣代替陳其美赴中國東北策動軍隊討袁。不過，按蔣中正的自我認知，反而認爲他前此勇於殺陶，因此孫中山對他刮目相看。至於東北的黨務工作，乏善可陳，惟期間他撰寫〈上總理陳述歐戰趨勢並倒袁計畫書〉，認爲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袁世凱沒有西方奧援，又得應付日本圖謀中國的壓力之際，以浙江爲基地，乘勢發展倒袁活動，深得孫中山賞識。孫特撥兩萬美金給他，命他回上海，籌設革命軍總部。他能文能武的特質，也藉由這次上書展露無遺。1914年9月的上海之行，使他從一個江浙地區的區域性幹部，一躍而成能爲革命黨把脈、獻計的明日之星。

不過，因保密不周，此次浙江起義鐵羽而歸。爲此，孫中山一度冷凍雙方關係，使得蔣中正於1914年底回到東京後，一直未蒙孫中山接見。直到翌年3月，陳其美藉返國處理黨務之機，力言東京本部與上海皆須仰仗蔣中正聯繫，這才使蔣中正得以重獲孫中山召見，雙方恢復直接交流的管道。

陳其美回上海後，前後發動的肇和軍艦兵變，以及襲取江陰要塞戰役，蔣中正無役不與，除了在第一線負責指揮作戰，也參與運籌帷幄的工作。藉由上海地區的革命活動，再度展現蔣中正允文允武的才華。也因爲陳其美與蔣中正的關係本即「焦孟不離」，1916年5月陳其美被刺後，蔣就順理成章地繼承了他的衣鉢，成爲上海地區中華革命黨的聯絡人。1917年7月，孫中山赴廣州倡導護法，海軍首先響應。至於策動海軍出面護法的經費，來自於德國公使資助，資金轉移則由蔣中正在滬一手經理。此段秘辛，不獨見證了蔣已繼承中華革命黨在上海的地緣關係，對他而言，也是與上海金融界建立聯繫管道的良好契機。這些人際關係的開拓，無疑地成爲建構蔣中正權力網絡的基石。

孫中山雖因德國公使資助，得以在廣州成立軍政府，宣揚護法，可是在後

繼無援的情況之下，爾後的革命大業卻似逆水行舟，充滿挫折及挑戰。1918年5月，軍政府廢大元帥，逼使孫中山出走廣州，以及1922年陳炯明圍攻總統府，公然叛變，皆為眾所周知的史實。

在面對一連串的眾叛親離後，忠誠之士難求，成為孫中山的切身之痛。而「勇敢、誠篤、知兵事」是孫中山對蔣中正的評語，勇敢、誠篤為個人特質，知兵事卻是一項特殊才華。對孫中山而言，蔣中正不僅忠誠可信，後一項特殊才華，更能反映時勢的需求。尤其孫中山面對陳炯明叛變後，總結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於革命黨沒有自己的武裝勢力，今後革命黨應以培養自己武力為首務；蔣的知兵事，當然更能得到孫中山的器重。

不過，從蔣中正出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為自己爭取到一個可發揮軍事長才的舞台之前，他於6年內，經歷過12次的辭職抗爭。孫中山終願將黨的新希望寄託於蔣，並交付建軍的重擔，主因即在於他的理念及行事風格，不僅得到孫中山個人肯定，也得到國民黨內核心成員及同志一致的認可。

索引書目

一、檔案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 「支那亡命者会合内容ニ関スル件」，1914年8月29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3，乙秘第1678號。
- 「支那革命ニ關スル」，1914年10月29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4，乙秘第2158號。
- 「支那革命ニ關スル」，1915年9月5日，收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7，乙秘第1786號。
- 「長崎縣知事李家隆介發外務大臣男爵牧野伸顯宛の報告書」，1913年9月1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7，高秘特收第1323號，原件。
- 「孫文ノ動靜」，1914年3月16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0，乙秘第647號。
- 「孫文ノ動靜」，1914年6月13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2，乙秘第1101號。
- 「孫文ノ動靜」，1914年8月29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3，乙秘第1682號。
- 「孫文ノ動靜」，1915年3月7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5，乙秘第491號。
- 「孫文ノ動靜」，〈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6-17。
- 「在上海總領事有吉朋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年7月10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2，機密第59號。
- 「在哈爾濱總領事代理領事官補川越茂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年7月24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2，機密第36號。
- 「在哈爾濱總領事代理領事官補川越茂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年8月5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2，機密第38號。
- 「警視總監伊澤多喜男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年8月31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3，甲秘第144號。
- 「神奈川縣知事石原健三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の報告書」，1914年9月4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3，高秘第2299號。
- 「福岡縣知事谷田留五郎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 報告書」，1914年9月6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3，高秘第8300號。

「在杭州領事館事務代理瀨上恕治發外務大臣男爵加藤高明宛 報告書」，1914 年 10 月 30 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14，機密第 36 號。
「陸軍大臣男爵石本新六發外務大臣子爵內田康哉宛の通牒」，1944 年 11 月 8 日，〈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陸軍學生の部〉，卷 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陸普第 3797 號，原件。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

〈振武學校學期試驗成績〔績〕表〉，原件。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蔣中正日記：民國 6 年前事略〉，原件。

〈蔣中正日記：1918 年〉。

〈蔣中正日記：1919 年〉。

〈蔣中正日記：1929 年〉。

〈蔣中正日記：1931 年〉。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蔣中正日記：1943 年〉。

〈政府公報命令〉，1914 年 6 月 15 日。

二、專書

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香港：龍門書店，1965。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全譯本第 4 冊》。台北：中央日報社，1975。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全譯本第 5 冊》。台北：中央日報社，1976。

申報索引編輯委員會編，《申報索引(1919-194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

宋 平，《蔣介石：總司令、委員長、總裁、主席、總統》。香港：利文出版社，1988。

李勇、張仲田，《蔣介石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

李國祁，《中山先生與德國》。台北：台灣書店，2003。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民國初年的奮鬥》。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周盛盈，《孫中山和蔣介石交往紀實》。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姚輝、朱馥生，《陳英士評傳》。北京：新華書店，1989。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冊 4、5。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秦孝儀編，《國父全傳》，冊 4。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9。

秦孝儀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0、28、29、31、35、36。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

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1。台北：未公開發行，1978。

崔曉忠，《青年蔣介石》。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

- 張憲文、方慶秋主編，《蔣介石全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 莫永明、范然，《陳英士紀年》。南京：南京大學出版，1991。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
- 湯志鈞編，《陶成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
- 萬仁元、方慶秋，《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 董顯光，《蔣總統傳》。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
- 劉紅，《蔣介石大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1。
-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下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
- 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淺野和生，《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陸軍》。群馬縣：關東學園大學，1994。
- 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蔣介石秘録2：革命の夜明け》。東京：サンケイ新聞社，1975。
- 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蔣介石秘録5：青年士官時代》。東京：サンケイ新聞社，1975。
- Loh, Pichon P. Y.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三、論文

- 王光遠，〈蔣介石早期的軍政生涯〉，《文史精華》，2002年第11期，頁51-59。
- 史哲，〈青年蔣介石的內心世界〉，《報刊薈萃》，2006年第11期，頁50-53。
- 余敏玲，〈蔣介石與聯俄政策之再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4，2000年12月，頁49-87。
- 汪偉華，〈試論從孫中山逝世至北伐前之蔣介石〉，《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頁120-123。
- 胡震亞，〈蔣介石早年性格特徵及形象重塑述評〉，《民國檔案》，2002年第4期，頁50-58。
- 桑鏞炳著，林放譯，〈早年的蔣介石先生（節選）〉，《檔案與歷史》，1986年第2期，頁97-100。
- 耿易，〈蔣介石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功與過〉，《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89年第4期，頁22-28。
- 莫永明，〈評辛亥革命前後的蔣介石〉，《學術月刊》，1989年第6期，頁76-80。
- 郭緒印，〈蔣介石早年與幫會的關係〉，《歷史教學問題》，1989年第2期，頁52-53。
- 陶菊隱，〈上海光復前後的李燮和〉，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辛亥革命七十週年：文史資料紀念專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黃黎，〈1926：蔣介石初露崢嶸〉，《黨史博采》，2003年第10期，頁29-33。
- 黃自進，〈蔣中正先生留學日本的黃金歲月〉，《近代中國》，期147，2002年12月，頁29-56。
- 楊天石，〈蔣中正先生和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近代中國》，2000年10月，期139，頁158-179。
- 靳明全，〈蔣介石並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 年第 3 期，頁 81-82。

墨軻(Peter Merker)，〈德國人眼中的孫中山〉，收入曾一士主編，《第四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父紀念館，2001。

鐘康模，〈陳炯明叛變前後的蔣介石〉，《廣州研究》，1988 年第 6 期，頁 51-55。

鐵 軍，〈蔣介石與討袁之役〉，《中原文獻》，卷 39 期 2，2007 年 4 月，頁 49-68。

田中健之，〈日本の中の近代アジア史(12)日本陸軍に留学した蔣介石〉，《中央公論》，卷 12 期 1，2007 年 1 月，頁 284-287。

黃自進，〈蔣介石と滿洲事變：「不絶交、不宣戦、不講和、不訂約」の對日政策の原點〉，《法學研究》，卷 75 號 1，2002 年 1 月，頁 377。

橫山宏章，〈蔣介石と上海交易所：仲賣人時代について〉，《中国研究月報》，期 527（1992 年 1 月），頁 15-28。

Li, Shou-kung. "Chiang Kai-shek and the Anti-Yuan Movement."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1:1, Fall 1987, pp. 70-111.

四、報紙

《民立報》，1911、1912。

《申報》，1922-1924。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hiang Kai-shek, 1906-1924

Huang Tzu-Chin *

Abstract

“Brave, faithful, and a strategic thinker”—such was Chiang Kai-shek in Sun Yat-sen’s eyes. This comment shows clearly how Chiang Kai-shek won Sun Yat-sen’s attention and promotion in competition with other revolutionary youths. Chiang Kai-shek’s bravery was first shown in his assassination of Tao Chengzhang, one of the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Alliance (Tongmenghui) and the former leader of the Restoration Society (Guangfuhui). Chiang killed Tao not because Tao opposed the revolution but because of his interest in the Zhejiang governorship and his desire to replace Chen Qimei, Sun Yat-sen’s close comrade and military governor of Shanghai. Given that Chen Qimei was part of Sun Yat-sen’s faction, and that resolutely killing Tao Chengzhang was to protect Chen Qimei, which was thus to protect Sun Yat-sen, both men would approve of the assassination.

Chiang’s skills at military strategy derived from his experience of military leadership with Northeastern National Army and the Guangdong Army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War. His expertise on military matters was quickly noticed by Sun Yat-sen, especially after Sun determined that it was their lack of military capacity that had doomed the revolutionaries to defeat. It is clear that Chiang Kai-shek’s political rise began during his headship of the Huangpu Military Academy. Sun Yat-sen’s approval was the key to Chiang’s becoming academy head. And in addition to Sun’s approbation, Chiang also fit the needs of the time for new leaders with practical abilities.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Sun Yat-sen, Chen Qimei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